



2024

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 案例集



关于南风窗

南风窗创刊于1985年，被外界誉为“中国政经第一刊”。

南风窗多年来深耕媒体领域，以其公允而独立的叙事立场、冷静而优雅的叙事风格而深得人心，在政治、经济及思想学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年来，南风窗成功实施媒体融合与转型战略，构筑媒体、智库和公益等多元发展的现代媒体集团，南风窗新媒体矩阵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迅速扩大，更具活力、深度和国际视野，已成为网络舆论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头部新媒体。

南风窗一直秉承“为了公共的利益”的初心，以“理性、良知和责任”为核心价值观，南风窗始终和那些推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力量站在一起。

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来自于这样的传承。

跨界、共创、创新

看见、表达、对话

SOUTH

CONTENT

目录

.
. .
. . .
. . . .
.

01 共振有声——2024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实录

2024SHEHUICHUANGXINDAHUI

- 05 2024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行动者并不孤独
- 11 AI时代，怎么让公益出圈
- 14 这种传染病，专门纠缠低收入人群
- 18 专访资深公益人：先行动才能找到解决方案
- 22 自从有了中国三轮车，非洲女人不一样了

REVIEWS

02 企业在行动

QIYEZAXINGDONG

- 27 帮走失者找到回家的路
- 31 爱心助餐 数智养老
- 34 年度企业案例

03 书写存在——2024南风窗公益新叙事征集

SHUXIECUNZAI

- 37 公众&公益，表达、对话、破圈
- 40 “换弟”的滚烫人生
- 45 在乡村夏令营，我放下了“城里人”的privilege
- 49 27岁，患了尘肺
- 53 阳光背后的阴影，谁来照亮？
- 57 足球少年，输了
- 62 菌子都旱没了！吃货哭了，而她决定做什么……
- 67 重走水路，一群“水上邻居”的气候行动与艺术共创
- 72 故事短片年度推荐
- 74 2024社会创新大会传播概览

2024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 行动者并不孤独



作者 | 王晴

编辑 | 吴擎

01

共振有声

——2024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实录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互联网在国内的铺展，降低了公益参与的门槛。以web1.0在国内的兴起为标志，技术与公益相结合的互联网公益在我国已走过两个十年。

技术无形中改变着人们关心社会的方式。从曾经2008年因天灾而生的专业公益机构，到如今人人可参与的“99公益日”互联网募捐，技术降低了大众关心公共利益的门槛，也给予了调动多元参与者合力行事的可能。

投身其中的公益人逐渐意识到，在社会议题已愈加精细的当下，比起闷头行好事，借技术链接公共议题的社会相关方，让“公益出圈”，更能形成集合影响力，从社会层面推动系统的变革。

观察、记录与链接时代中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各方，亦是媒体的责任。9月7日，“2024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在深圳举办。

用技术链接善意

在AI技术的浪潮蔓延至各领域的当下，公益行动者们共同面临一个现象：如今的公益，不再是捐赠硬件设施的简单行动。从教育、医疗、环境到乡村振兴等社会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受助者们需要的不再是硬件平等，更需要接触技术、使用技术的机会平等。

这要求公益不再是“孤举者”，而是社会力量的融合。但多元的参与方，也对公益的组织与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现实的种种复杂问题，以及多元的关注力量，公益组织者如何更好地协调各方，帮助资源合力参与公益？善用技术，创新公益模式，有效配置资源，成为公益良性运作的关键。



“公益创新针对的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且要对这个领域有较大改变。因此公益创新需要做到大规模推广，并且成本相对较低，最好能被政府与企业所接受，进一步形成推广。”投身公益事业15年的国务院原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指出，可持续的、有影响力的公益行动，必须考虑其成本与规模化的问题。

汤敏进一步阐释了如何善用技术，扩大公益影响。在友成基金会过往的乡村支持活动中，通过网络授课，基金会能统筹北师大、清华大学、三甲医院医生等资源，为乡村青年教师、返乡创业青年及乡村医生进行持续培训。

十年不到的时间里，类似培训直接惠及17.8万名乡村教师、18.3万名返乡创业青年，以及中西部县域医疗单位和医生。以青年教师培训为例，每名教师培训成本在四百元左右，成本可负担。

但就数量上看，与上千万返乡青年相比，近20万的培训人数仍然杯水车薪。在汤敏看来，扩大公益范围的难题更在于如何将好的资源配到需要的人身边。他提出“公益包”等计划，鼓励全民参与公益传播。人们在了解公益包内所涵盖的培训资源后，可将其介绍给身边需要的人使用，这一传播行为，也能被视作公益行动。

借助人与技术的协同，资源能更准确地流动至更广泛的乡村地区，赋能更多人。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乔栋同样提及，在数字技术从“人找信息”进化为“信



息找人”的时代，鼓励员工利用技术创新公益行动，能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为各公益组织搭建一个更技术友好的平台。

在技术向善的当下，逐利不再是企业唯一的准则，企业的外部性亦让人们关注企业行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乔栋提及，字节跳动鼓励员工用技术解决在工作中发现的社会问题。借助公司人工智能、精准推送等技术，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成为“链接内容资源、技术资源和公益平台”的公益创新者。

从2016年最早的公益项目“抖音寻人”开始，到如今为公益组织提供公益电子票据服务、火山引擎公有云服务、飞书一体化协同，以及开展“识典古籍”AI古籍修复与数字化整理等项目，字节跳动作为技术支持方，不断通过技术改良，降低着人们参与公益的门槛。

以“抖音寻人”为例，字节跳动通过精准推送技术，将寻人信息定向推送至失踪者活动范围内的用户信息流中，提高知情者看见信息的概率。类似的大数据技术，能更好地链接公众善意，提升公益行动效能。



这正如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桓世彤所言，“用技术传递关怀，才是了不起的创新。”奔走于减少乃至消除结核病危害前线的桓世彤，亦提及汇聚技术力量，创新公益行动在医疗领域的必要。

结核病是世界第二大单一传染病致死病因，2022年全球有130万人死于结核病。桓世彤在分享中提到，结核病是当前单一传染病致死率最多的疾病，不仅有相当比例难以治愈，更与贫困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内70%结核病患者来自农村，80%为低收入群体。难以被识别的发病症状、高比例耐药群体等等，均让结核病这一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古老疾病在当前仍难被控制。

在基金会的推动下，更多技术得以汇聚至结核病诊断、治疗与后续防控流程中。以结核病诊断为例，如今基金会已支持机构开发出一个成本更低、更便携的结核病诊断设备，将单个结核病诊断仪器的成本降至一百美元，单次诊断成本也降低到3美元。类似的创新技术不仅可用于结核病诊断上，更可在适应改良后推广至其他流行病诊断中。

和其他领域一样，技术创新在公益领域的应用能带来巨大成效，让具体的行动更低成本、可负担、可持续。盖茨基金会的目标是开发一个创新的疾病防控模式，希望运用新的工具和方法，系统解决结核病的问题。桓世彤表示，“希望十年后，我们能共同见证一个消除结核病的世界。”

行动的力量

尽管当前，公益对技术要求更高，但行动者们亦表示，要解决种种社会议题，最需要的仍然是更多人到场关注，积极参与。



在公益对谈环节，南窗记者黄茗婷对话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海市，共同探讨了在公益领域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实践中成长”的故事。

李海市分享了他自己在乡村体育教育、公众食品健康等领域的公益实践行动。他认为，创新的公益方法与想法，往往来源于在社会现场的观察。

真实地走入乡村学校，人们会看见学校需要的已不是单纯的体育用具，而是让每个学生走上运动场的体育教育；走近自然，环境污染对自然的损害、对公众健康的侵害，也变得直观可感。在现场的观察，驱使着李海市一次次重新调整方向，走向更贴近对象需求的公益创新。

李海市表示，行动远远大于讨论，绝大部分创新不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而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做得更好。“和企业创新一样，公益创新也许90%是不成功的。但在社会创新方面，成功的反义词不是‘失败’，而是学习的成本、探索的过程。”

观察公益创新的现实案例，解决一些看似宏大的社会议题，往往起源于微小的举动。

作为美力非洲（Mobility For Africa）中国合作协调人，吴雨浓分享了用电三轮车赋能非洲农业



发展、发挥女性潜能的故事。一台可以载物的电三轮车，可以极大提升非洲女性的劳动效率，将重物从她们的头顶转移至三轮车载物座，更帮助非洲的医疗、农业、教育、商业等多领域解决最后几公里的难题。

围绕电三轮车，美力非洲在非洲农村搭建起光伏离网充换电站，并用共享与分期付款的方式，支持更多当地人获得电三轮车，提高工作能力与回报。吴雨浓笑言，这一“三轮车+”的故事，让一个非洲当地的女人想开车去任何地方时，她都有能力这么做。

扬翔股份董事长莫金枝，则分享了用技术解决国内乡村养老难题的故事。在年轻劳动力外流的乡村，困扰老人的往往是开火煮饭等日常小事。

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高岭村，扬翔股份建立起一个创新爱心食堂。通过“智能烹饪设备+即烹生鲜速冻食品+数字化服务平台”，乡村能低成本搭建爱心食堂。

无需专门厨师与明火开灶，乡村老人能自行在食堂中加热即烹生鲜速冻食物，借助数字化服务平台，该爱心项目也能全链条监督，完成从公益捐助到食物入口全流程的管理。从今年初开始，爱心食堂已覆盖一百多个村镇社区，累积助餐人数超2万人。民以食为天，乡村养老中的食物难题，可在这一数智助餐服务模式，更好地得到解决。



除了公益圈内的关注，我们如何向更多人讲述公益，吸引社会更多元的力量参与公益？今年，南窗发起“公益新叙事”的征集。阿拉善SEE珠江项目中心区域代表陈思远，与自然之友玲珑计划导师卢辉，分享了吸引普通人参与环境议题的新叙事。

在广州珠江流域的小洲村，一场场水上桨板活动、1立方米展览及水上摄影展，吸引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参与者，这是千禾社区基金会和阿拉善SEE珠江中心发起的“粤港澳大湾区气候行动小额资助计



划”所资助的一个项目——“水上社区计划”。

“水上社区计划”通过桨板、展览等轻松的方式，吸引不同人群走进珠江水域。在一场场水上观鸟、水底捞物、物品搜集与共创中，人们直观看见人类活动在自然中留下的痕迹。后续的展览，进一步引发人们关于环境保护的思考与讨论。据陈思远分享，类似的气候小额资助计划，已吸引当地2500多名公众直接参与，讨论10余个气候细分议题。

频发的极端天气，则让一名临床工作16年的医生卢辉，跨界参与至自然之友“玲珑计划”中。“玲珑计划”又称“公民气候行动计划”，旨在帮助不同行业背景的参与者打磨气候公益项目，为有意关注气候

议题的人们提供计划支持，达成气候话题的破圈。

医学背景的卢辉表示，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也产生了许多影响，如高温天气下的热射病、雷雨天气影响下的“雷暴哮喘”等，但更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应对意识。在“玲珑计划”支持下，卢辉制作了高温天气下老年人健康防护手册、以情景喜剧为表达方式的医疗科普，通过健康话题，引起更多人对气候变化的重视。

如今，中国公益慈善正迈向下一个十年，这也是我国2035年远景目标逐步实现的十年，幸福生活逐渐成为更重要的价值导向。在气候变化、社会公平等议题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愈加显著的当下，人与公益行动已不再是单向的资助与受助的关系，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是置身事内的利益相关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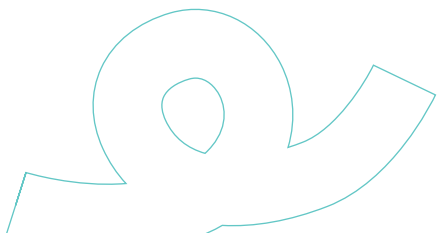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与大家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公益创新与社会创新。南窗做的一期杂志《公益出圈》引发了我们的深刻思考。

在当今时代，不仅企业需要出圈，公益也同样需要突破传统的边界，以创新的思维来推动未来的发展。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公益的影响力。

公益如何创新？

社会创新，是对社会问题提出的全新且高效、公正的解决办法。它关乎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在教育、医疗、乡村产业发展等诸多领域，我们都面临着各种挑战，而社会创新正是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有力武器。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然而，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如何让孩子们上好学一直是个难题。我们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深刻认识到，提高乡村教师的水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培训了将近 20 万的乡村教师。通过互联网把北师大优秀教师的课程送到中西部的乡村学校中去，通过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来为乡村孩子们提供了更好的教育资源。这种模式不仅有效，而且具有可大规模复制，为改善乡村教育质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医疗是民生之需，关系着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在农村地区，医疗水平的提升是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基金会开展了“千院万医”计划，在全国组织了 15000 多名三甲三级医院医生，为乡村的村医和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提供线上培训、线下指导以及巡回医疗，让更多的医生能够受益。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希望能够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减少因病致贫的情况发生。

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目前，中国有 1100 万的返乡青年，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在乡村创业，带动乡亲们致富，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友成基金会与中国慈善联合会与清华大学社会学院联合起来开展了“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对这些在农村一线的创业青年进行培训。连续 5 个月的培训内容丰富多样，包括线上学习、线下孵化、学员交流等。表现优秀的学员还可以到清华大学来继续培训一个星期。此外，我们还建立了学员交流群，促进他们之间的沟通、支持和激励。通过这些举措，我们为返乡青年提供了发展的平台，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

然而，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尽管我们已经培训了 20 万的乡村返乡青年，但在 1100 万的返乡青年群体中，这个数量仍然微不足道。我们培训了 16 万的乡村教师，但对好几百万的乡村教师来说，还是少数。因此，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公益资源包的方式来扩大公益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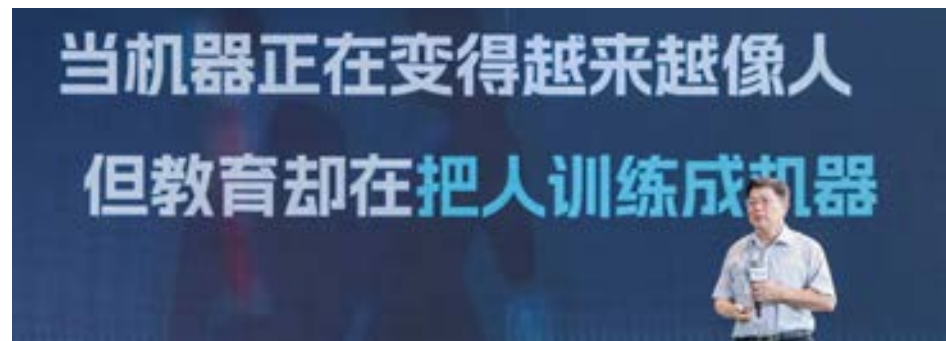
我们将教育、养老、医疗等资源整合起来，做成一个个公益包，其实也就是一个个的互联网的二维码，只要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报名参与各种培训，获取相关的资源。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于公益资源，同时也希望能够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服务中来。我们倡导每年每人进行 3 到 5 个小时的公益服务，包括参与培训和传播公益资源包。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可以让公益的影响力得到更大的发挥。

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公益创新？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社会的创新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让我们

深刻感受到人工智能的强大力量。与过去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元宇宙等技术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对于公益界来说，人工智能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例如，在一个对农村妇女电商培训的项目中，我们就在帮助她们如何使用文心一言、豆包等 AI 工具来写广告词、做广告、做数字分身等。这些工具的应用，能够帮助农村妇女更好地开展电商业务，提高收入水平。



在公益实践中我们还认识到，在人工智能时代，培养创新人才是至关重要的。最近，我参与了深圳零一学院的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零一学院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四年前在深圳创立的。他们在中学、高校中挑选一批有创新潜力的学生，邀请了一批院士、专家为这些学生提供帮助。

今年暑假，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挑选组建了一批中学生和大学生，推出了 9 个题目，包括低空飞行、在火星上生活等。其中，我负责一个与社会创新相关的课题：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进行大规模的培养创新人才和促进社会公平。让学生们用项目式学习的方式，在老师的引导下，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度地讨论，最后拿出项目计划书。

其中的一个研究课题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的数字分身来缓解我国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的亲情缺失问题。我们国家有几千万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城市打工，他们缺乏亲情的陪伴。同时，城市和农村也有许多孤寡老人，孩子不在身边，他们也需要亲情的陪伴。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很难得以解决。人工智能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呢？现在人工智能的数字分身技术已经存在，有没有可能给在外地打工的家长，给远离老人的孩子们建立一个数字分身，来陪伴留守儿童、孤独的老人呢。

我们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他们提出了很多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包括如何推动目标的实现、如何降低各种成本等。这个创新班不仅在深圳开展，还在北京和福州开设了远程班，通过远程讲课的方式，让不同地方的学生都能够参与讨论。这些训练最重要地要打开学生们的创新思路，形成创新思维的习惯。

这些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公益实践都证明，人工智能能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使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社会问题，制定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我们有可能更好地了解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公益项目。同时，人工智能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公益项目的执行效率，降低成本。

我相信，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公益出圈，推动更多的社会创新，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这种传染病， 专门纠缠低收入人群



演讲 | 桓世彤

整理 | 张婉莹

在过去，传染病似乎距离人们很远。

新冠疫情的暴发重新将传染病带回公众的视野，人们发现，原来传染病和我们有如此大的关联，也对人类社会产生着比想象中更多的影响。

那么，如何用技术传递关怀，如何用有温度的创新，给疾病患者带来新的生活？9月7日，在南风窗主办的“2024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上，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桓世彤分享了如何用技术创新，更好地诊断、治疗结核病的案例。



结核病从未远去

很多人觉得结核病已经不复存在。其实不然，作为一种存在超5000年的传染性疾​​病，它有着超乎人们想象的生命力。

在今天，每4人中就有1人感染了结核，体内存在休眠的结核菌。数据表明，全球每年约有1000万人发病，130万人因结核病死亡。这意味着，除新冠疫情三年中，新冠病毒的致死人数曾超过结核病致死人数外，过去10年间，结核病都是单一传染病致死人数最多的病种。

中国每年结核病新发人数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居全球第三位，每年约有75万人发病。其中，约有3万人是耐药性结核病。罹患耐药结核病，意味着常用的结核病治疗方案无效。患者需要花费更贵的价格、更长的时间，如二三十万元的治疗费与两到三年的治疗时间，才能获得一半可以治愈的机会。

此外，结核病与贫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数据统计，约70%的结核病患者来自农村，50%来自西部地区。从患者收入来看，约80%的结核病患者来自低收入人群。

如何防控结核病，有一个全球性目标。世界卫生组织在《终止结核病策略》中提出，要在十年内，即2035年“终止全球结核病流行”，结核病发病率下降到每年每十万人发病人数少于10个。这意味着，需要在10年内，让结核病发病率在中国降低5倍，在全球降低10倍。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够完成治疗。

用技术传达人类之光

历史上，人类曾多次成功“消灭”传染病。诸如针对天花病毒，人们研发出有效疫苗等。然而时至今日，都未出现能预防结核病发病的有效疫苗。因此，只有尽早发现病人，才能阻断结核病的传播。可是，结核病的症状只是咳嗽、发热、咳痰等，与流感和呼吸系统疾病非常类似，并无特殊症状。如何能在庞大的人群中，快速发现结核病患者？

以往，检测结核病使用的是显微镜。医生发现疑似结核病患者后，让其留痰并制作涂片，放到显微镜

下寻找结核菌。这需要查看300个视野去寻找到染成紫色的结核菌。而要诊断耐药结核病，需要做结核菌培养和药物敏感实验，通常耗费3-6个月的时间。

随着2008年前后分子诊断的出现，显微镜被替代了。医生只需把痰标本放在试剂盒里，再放到仪器中，就可以在2小时内获得诊断结果，并了解患者是否耐药。相较于过去，检测时间大大缩短。但这种仪器仍只能使用痰进行检测，而很多结核病人是没有痰的。此外，一台分子检测仪售价约50万，一次检测价格在300元，成本高昂，患者花费也更多。

现在，通过技术变革，开发出床边检测试剂。结核病检测采用一种很小的、可以放在手掌上的仪器，就可以又快又准的发现病人。相较于50万一台的分子检测仪，这样一台仪器的成本为700元人民币，而做一次检测的费用大约20元人民币。此外，这台仪器进行检测时可以用痰液，没有痰的患者也采用舌拭子的检测方式，效果不输分子检测仪。

发现结核病人后，治疗过程也不容易。确诊后，普通结核病人要治疗6个月，耐药型结核病人要治疗2年以上。同时，治疗费用也不低。普通结核病的治疗费用差不多1.5~3万元人民币，而耐药型结核病的治疗费用则高达二三十万元。如果不规律服药，普通结核病患者会有发展为耐药型结核病的风险。

尽管结核病患者了解服药的重要性，但好好吃药还是很难。在治疗结核的半年内，患者可能要吃下3600片药，一顿也不能落下。服用结核药有很多不良反应，可能有胃肠道不适，皮肤瘙痒，甚至视



电子盒药

力下降等。一时疏忽，就会导致“断药”的发生。

什么办法可以代替医生，提醒病人好好吃药？电子药盒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

左图的老人手中拿的是一个电子药盒，药盒里面放了她要吃的药，每天这个药盒都会提醒她服药。而在服药的时候，药盒会对患者的服药数据进行记录，所以医生会及时知道病人的服药情况，判断病人是需要

进一步干预，还是继续吃药治疗。

此外，通过手机和一些在线设备，病人和医生可以联系起来，病人有任何问题医生都可以随时医治，提供针对性、人性化的服务。

除此之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一种全新的耐药结核治疗方案，让治疗周期从原来的2年变成6个月，药量也由原来的一把药变成3片药，而且治愈率由原来不到50%到现在达到90%以上。

不要让费用成为治疗难题

在过去，医疗费用也是防控结核病的一大难题。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全球目标中提到：不要让医疗费用成为治疗结核病的障碍。

在中国，患者诊治过程中的医疗保障主要为医疗保险。而在这种形势下，会存在医保、医院、患者三个不同的利益方，他们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对于医保资金方，必须保证资金的安全、有效和可负担；对于医院来说，则需要考虑到生存和发展的的问题；而对于患者，则希望能够承担得起治疗费用。

如果不对三者进行任何干预，则会演变出如下的形势：医保资金方为了保证资金安全，就会减少报销项目或只报销部分；医院为了生存发展必须让病人做尽量多的服务项目，由此产生收益；如此下来，病人治病的费用就变得无法负担。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首先需要明确：医疗保险买的不是治疗的行为和服务，而是健康和治疗结果。最好的解决方法，应该把门诊和住院结合作为整个患者治疗的全流程，按照病人的治愈情况打包付费，让医院有更多的灵活性。医院只要控制成本，把病治好，就可以获得收益，同时医保资金也是安全有效的。

如何实现消灭结核病的最终目标？

前面我们提到，用新兴科技来更早地发现病人、治愈病人、解决病人的医疗费用，但这些能不能帮我们很快实现“消灭结核病”的目标呢？仅仅这些其实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

以人类经历过两次跟冠状病毒有关的疫情为例，一次是非典，一次是新冠。非典非常快、很容易地就被解决掉了，而新冠的解决就很慢。

这两种传染病真正的差异是什么？非典是先有症状，然后才传染别人，所以很快就被发现并控制。而新冠没有症状时也在传播，所以很难被控制。结核病和新冠是一样的，研究发现，70%的结核病传播是发生在没有症状或未就诊的群体中。

这也表明：如果要消除结核病毒，就不能坐在医院里等病人上门，而必须要主动地去筛查结核病患者。通过AI辅助数字胸片检查，结合医疗机构、体检车和便携设备等不同场景，可以通过筛查，主动发现结核病。

目前还没有针对结核病的有效疫苗，但是疫苗对于任何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都是最有利的工具。

盖茨基金会也正在支持开发结核病疫苗，并与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共同投入5.5亿元支持一项新的结核病疫苗临床试验，希望在2030年以前有一种新的疫苗可以被使用。虽然这项疫苗的开发成本非常高，但也不能确定一定会成功。即使研发成功，也只能预防一半的结核病发病。因此，需要更多科学家和更多新技术投入，让疫苗变得有效。

在科技向善引领发展的今天，所有科技进步都真实地改变了病人的生活。用技术传递关怀，才是了不起的创新。



和很多中国公益人一样，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海市做公益的初心和起点，源于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当时还是一名公职人员，在这之后转型成了一名公益人，后来加入阿里，成为了阿里第一个专职做公益的员工。在此之后，他分别参与了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职业教育、体育公益的一些项目和活动。

9月7日，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现场，李海市与南风窗记者以《创新的行动者，在实践中成长》为题展开对话。



南风窗：蔡崇信公益基金会提出“以体树人”。体育公益怎么实现创新？请您讲讲您的一些体会。

李海市：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一直是一个公益的行动者和创业者。过去的体育怎么做？通常意义上讲，孩子的运动少，我们就让他多点时间；学校体育器材、场地不够，我们就捐一些器材；学校体育老师的专业性不够，我们就去培养体育老师。这些方法对不对？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不够的，尤其是当你面向全员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这里我有一张图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在支持的一所学校，这个图上大家看出什么了吗？



这个场景在以往的学校里很少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一所学校，一般是配备一个足球场，几个篮球场。那我们会发现，一所学校里面，只有5%的孩子能经常打比赛。95%的孩子是没有上场去打比赛，没有享受过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滋味的。

还有，我们永远是组织一些校队。评价一个学校体育好不好，就问它的校队拿有没有拿冠军。但很多孩子没有享受体育。

所以，我们打破了这些学校原有的体育教育场景，把它的足球场全部切割出来，做成很多的足球场，篮球场做成很多的小篮球场，让很多孩子都在那里运动。我们现在跟学校合作的时候，唯一的要求是，学生要100%上场。这个其实难度就大了，场地要重新优化，老师要重新调整，还要做比赛设计。

南风窗：您最初参与公益的时候，在杭州成立了啄木鸟环境与食品安全中心。这是国内第一个专注于食品安全的NGO组织。您对于食品安全公益有怎样的心得呢？

李海市：我入职阿里之后，作为一个环境保护的项目经理，在全国做了很多环境保护的资助、合作，还有大量的调研工作。这里我想放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自己去全国走访了大量的环境污染的现场。



像这个照片是我在浙江钱塘江的源头拍的，在安徽那边，新安江。我手里拿的是医疗器械的垃圾。医疗垃圾怎么可能出现在河边呢？它是永远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但遗憾的是，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说明我们的医疗的垃圾的管理、环境的管理，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走了很多地方，那些水比酱油还要黑。因为水和空气而导致一些人患癌的现场，我看过很多，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我们的倡议是说，做环境保护目的不是减慢环境污染，而是要唤醒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让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一起行动。但其实我在做项目经理的过程中，当我在遥远的上游，或者说我跟公众讲这些环境污染现场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所感触，说“太不应该了”，但是仅此而已，然后呢？可能就没有然后了。那什么样的事情能真正触动我们公众的行动力呢？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环境污染不仅仅影响饮用水和空气，还大量通过食品进入我们的身体。从农田到餐厅，污染一定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我就想，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我在2012、2013年查了一下，国内关注食品安全的公益组织，几乎是0。我其实是很纳闷的，那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大家广泛议论，而且当时也爆出三聚氰胺的事情，为什么没有行动者呢？虽然政府当时有大量的打击工作，但是民间还没有人做这个事。所以这些事就是我的事。虽然怎么做，我的想法还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一定要先做，很多事是你先去行动才会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先有解决方案再行动。

南風窗：从刚刚的体育公益到现在的食品安全，您的整个的公益事业跨度很大。您能不能讲一下，您每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是怎么去发现这些领域里面的需求，怎么去进行创新的呢？

李海市：社会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是目的。所以我们社会创新的所有的前提是要定义问题，要想清楚这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利益相关方和什么原因造成的。作为行动的个体也好，作为一个组织也好，你需要确定的是，你的使命愿景是什么？这个很关键的，你只有把这些问题界定清楚，然后围绕这些地方来进行创新和行动，才是有效的。

如果对一些问题界定不清楚，怎么办？你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你不断地去摸索，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说进入食品安全领域，你要多看行政部门在干什么。行政部门干什么，你就可以去尝试着干什么。当然我们没有执法的权利，但是可以做一些检测，比如说在环境保护问题中，检测一些污染源，做一些公众倡导；也可以做一些环境治理。

作为一个公益从业者，初步进去的门槛其实并不高。只要这个问题对你来讲足够重要，你足够关心它，你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法。但是前提是你需要有耐心，需要不断地摸索，去试、去犯错，在这个过程中才会慢慢成长。

南風窗：在摸索、试错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遇到失败了，要怎么去调整？我相信这是在在座很多公益人士、参与社会创新的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在社会创新里面怎么去处理失败，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样的见解？

李海市：创新一定会面临失败，创业也一样。应该说90%以上的创业、创新都不是很成功的，其实这个大家心里都有一个预期。

但是在社会创新领域，我认为，创新的成功的反义词不是失败。我觉得它是一个学习的成本、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你做好这个准备的话，我觉得心态方面就完成了。

这里面还有一点是，你在做社会创新的时候，要做好自己在成本和时间上积极投入的一个准备，不能一头扔进去就不管不顾，这个很重要。

我碰到过很多的公益从业者，包括一些大学生。创业要谨慎，因为成本高风险大，但是创新是可以

的，因为创新不一定要做很大的创新，其实你做一些小而美的创新，今天比昨天做得好，明天比今天做得好，都是我们自己的创新。

人总是有大量的需求，这个学习的过程，一定会对你的认知、你的利益相关方、你的受益的对象有一些促进和改善。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南風窗：作为一个社会创新的行动者，您觉得这16年里面您实现了什么样的成长，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关心公益、推动社会创新的人士呢？

李海市：我想说两点。第一个，好奇心很重要。人一定要对各种新鲜的或者说固有的社会现状会产生好奇和疑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理。比方说，这个酒店就应该这么建吗？我们交通规则就应该这么做吗？我们的足球天然就应该这样吗？当你不断产生这些问题、好奇的时候，其实后面能够引发很多东西。这是我做十几年的公益创业行动，得到的一个很好的启发。

第二个，理解慈善和公益的区别。这是一个老话题。慈善是表达我们的爱心，作出我们的善举，授人以及时的解困。不管是传统还是海外，都在积极的倡导慈善。这没有问题，应该大力去做。而公益是“为了公共利益”，是需要有目标、有策略、有团队计划和预算，是系统性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我引用经济学的概念。新的生产力的产生跟工业结合总会出现很多发展和变化。但是如果仅仅是新的生产力出现，其实很多时候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还要考虑生产关系的问题，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协调才能不断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我回到刚才第一个例子，关于我们全员学生比赛的问题，我们过去已经改变技术、培训体育老师，甚至我们的教练去到学校里，好像就能把问题解决了。实际上不一定的，能解决的问题很有限，那我们后来怎么办？

我们认为孩子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老师的问题，还是校长的问题、教育局局长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设计项目的时候，我们的培训是面向整个学校。我们还跟局长合作，因为孩子的健康其实不只是学校的事情。我们要跟局长聊，跟校长聊，跟每一个老师聊。



“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在非洲津巴布韦的村落，出现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三轮车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地区？这是社会公益企业“美力非洲”在做的事情——用中国的交通工具，帮助非洲妇女。

9月7日下午，美力非洲（Mobility For Africa）中国协调人吴雨浓在2024南风窗社会创新大会上分享了来自非洲的这段录音，她也分享了美力非洲用电动三轮车为非洲农村地区带来的改变。

“如果我们可以把男人送上月球，为什么不能把女人送上驾驶座呢？”



交通难题增加非洲农村的生存压力

在非洲地区，交通出行是人们面临的一大难题。崎岖的道路、匮乏的交通工具，将人们与外界隔绝开来，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非洲农村的人们，步行是主要的出行方式。然而，非洲农村地区的道路条件恶劣，距离遥远，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出门还要花钱，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而言，交通成本占收入比例高达20%-30%，成为沉重的负担。

此外，工具的缺乏也大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尽管粮食总体收获量很大，但由于每人每次只能背有限的一筐，导致能被送到市场的食物数量十分有限，在粮食危机问题本就突出的非洲，又额外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另一个问题是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非洲，基层卫生中心距离居住地很远，患者只能选择步行或乘坐驴车达到诊所，或依赖医疗人员步行上门服务。对于紧急的医疗需求而言，这显然太过低效了，这也是非洲孕产妇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

中国电动三轮车开启改变之旅

在如今的非洲，大部分地区仍是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经济。面对如此严峻的交通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美力非洲的创始人白杉（Shantha Bloemen）是一位在非洲生活超20年的联合国外交官。2014年，她被派遣来到北京工作，见证了中国绿色能源、绿色交通及共享型经济的加速发展。白杉在考察中国农村地区时，发现电动三轮车这种交通工具十分便利，可以帮助农户解决很多问题，而且绿色、可负担。因此，她萌生了把三轮车带去非洲试点的想法。

就这样，美力非洲的探索，在位于南部非洲腹地的津巴布韦启动了。不过，一个“外来物种”想要推广，首先要取得当地人的信任。三轮车是否安全？产生的效果如何？美力非洲在韦扎镇尝试了小规模试点。他们带去了30辆三轮车，让90名18-68岁的妇女利用三轮车售卖她们的农作物。效果十分明显。三轮车的后车厢代替了箩筐，农户们以更高的效率运输和出售作物，这种新的“方式”不断吸引着新客户。



当然，在试点中，团队也逐渐发现更多问题。

首先，电力的来源亟需解决。在非洲地区，能源供应至今仍是紧迫，超过一半的地区和人口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部分严重的地区每天仅有几小时供电。在中国，三轮车可以开回家充电，但在非洲农村，这并不现实。

团队意识到，或许可以改变策略，在村庄中建立换电站。在站点用光伏集中充电，用户耗尽电量后，可以直接来更换电池。而非洲农村路况差、社区到服务点的距离远的现状，也要求三轮车有比在中国更长的续航能力、载货能力。

而在那时，中国也并没有满足要求的“换电三轮车”。创始人白杉辗转找到了一家中国储能公司“江苏简谐能源”，创始人赵睿忱曾是特斯拉工程师，决定帮助美力非洲定制开发适合三轮车的磷酸铁锂换电电池，以及配套的充换电设施。

同时，“换电”模式更要求用户的任何问题能及时得到在地解决，因而与大部分当地企业不同，美力非洲必须重视售后服务，而作为当地新能源出行领域的先行者，更要自己花心思培养技术人员。



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美力非洲已与当地职业学校合作，在中国企业简谐能源的支持下，开发了一套电动出行技术职业培训课程，支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当地的人才储备。

另外，就是资金来源问题。项目初期，美力非洲获得了许多慈善资金的资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商业模式。到今年，已有百余位用户可以稳定的进行分期付款购车、定期换电，回拢的运营资金也能够补充企业收入，使企业可持续发展。

在非洲，无论是疫苗、农业还是电商物流等问题，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运输，一直都是难题，而美力非洲的解决方案则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开启“三轮车+”时代。

为什么是女性

在美力非洲支持的三轮车项目中，绝大多数的用户为当地妇女。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女性作为用户主力？

创始人白杉曾在主题演讲分享道，“起初，男人们非常嫉妒：为什么是女人们得到这种交通工具？为什么不是他们？但他们逐渐明白了，如果女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她们就能赚更多的钱，也不会那么唠叨他们了。”

对于非洲女性的形象，多数人会想象出一幅妈妈背着孩子辛苦劳作的画面。这种看似轻松的“女超人”姿态背后，却是巨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不仅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而且作为农业产销的方式，也是一种低效的手段。

中国三轮车的引进，让妇女们也可以享受自由出门、高效贸易的权利，让她们可以优雅地“无所不能”。“随着三轮车的引入，我们看到了性别关系的巨大转变。比如男人不得不问女人周日是否可以顺便载自己去教堂或去参加葬礼，不是男人载女人去哪了，而是女人在给男人搭便车。”比如这张照片中，女人开着三轮车卖二手衣服。这意味着她不需要坐在市场上干等，而是可以上门推销。



吴雨浓分享称，美力非洲希望提供一种选择，当一个女人想要骑车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时，不会因为缺乏交通工具而被限制在家里。“我们始终期待有一天，人们不再质疑‘为什么是女性’。我们的目标是打破性别界限，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择和机会。”

帮走失者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唐辛子

编辑 | 吴擎

刘红涛在朋友圈里，发了很多家人团圆的视频。

视频往往很嘈杂，锣鼓声、鞭炮声，夹杂着人们说话的声音。画面中央总是两三个紧紧相拥的人，他们在哭，但还是大声地告诉彼此：“我一直在找你。”“我终于回家了。”

这是刘红涛作为公益寻人志愿者的日常。视频里的主人公是走失者和他们的亲人。为了这一场团圆，他们大多已经等待了数十年。

很多人仍在等待。有人通过志愿者直播、拍视频讲述自己寻亲的经历；有人把寻亲信息做成图片，到各个相关视频下评论留言；也有人专门注册了寻亲账号，在主页介绍里写满了自己和亲人的个人特征——细节到两个发旋、脖子上的一颗痣，或是无名指上的螺纹。

对于每个寻亲者而言，团圆依旧不是一件易事。在走向团圆的道路上，“技术”与“善意”的结合，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举手之劳

刘红涛遇到的第一个走失者，是一个流浪的老人。

老人倒在农村的水井房旁边。2007年，刘红涛住在河南省中牟县下的一个村子，那天他要去抢水井浇地，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缩着身子躺在一旁，动也不动。

要和老人沟通并不简单。刘红涛把老人叫醒，问他是哪里来的，可老人说的话，刘红涛听不懂。他只能耐下性子，先去帮老人买了点肉、几个馒头和两瓶水，然后拿着地图坐在老人身边，等他平复了心情再慢慢聊。

刘红涛偶尔能听懂几个关键词。老人说自己是“蒿坪镇的”，这个镇在陕西，刘红涛辗转联系上了该镇的派出所，但不对，他们那里没有老人走丢。聊着聊着，老人嘴里又蹦出一个“前进村”，刘红涛又给村委会打电话，才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女儿。

成为“走失者”，意味着很难凭自力回到家中。抖音寻人项目统计的走失原因显示，29.92%的走失者属于认知障碍（包括阿尔茨海默症），41.75%则是由于精神疾病，疾

02

企业在行动

病让他们丧失了回家的能力。

另一些人则离家多年，缺少关于家的记忆。有人儿时被遗弃、送养甚至拐卖，记不得家里的情况。有人长期住在山里，只知道附近有几家人，对“村子”这种区划没有概念。有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只知道一个小名。

志愿者要想尽办法。帮助第一个老人时，刘红涛还求助不了高科技，只能拿着地图，坐在田里和老人聊了三四个小时。志愿者甘彪曾帮助过一个流浪老人，老人不会说话，甘彪没有线索，只能每天给老人拍视频发到网上，一共发了四百多个视频，花了一年半时间，才终于被老人的家属看到。



儿，他一直过着孤僻的生活，“脸上没有笑容”。

“对于寻人来说，团圆真的是一个奢侈。”刘红涛说，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

随着接触的走失者越来越多，刘红涛逐渐意识到，有时候，帮助走失者回家并非“举手之劳”这么简单。

起初，他能帮助的人有限。刘红涛接触的多是偶然遇到的走失者，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求助警方，或是通过线索联系走失者的老家。有时候，遇到智力障碍，或难以沟通的走失者，刘红涛会有些束手无策。

技术让困难有了改变。2018年，刘红涛在外甥女的推荐下，注册了抖音账号“宝贝回家-放飞心情”，开始用抖音发布寻人信息。公益内容为他吸引了不少流量和粉丝，用抖音6年，他寻亲成功的案例就已经超过过去11年的总和。

大数据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一个女孩一岁半就从家里走失，除了知道自己来自河南省博爱县之外，什么都不记得。挂上抖音的线索，只有一张养父母给女孩拍的照片。照片先是被一个网友看到，“我们村有一个（孩子）就是在博爱县丢的”，网友把照片发到村民群里，家人一看就认了出来，

“这就是当年我走丢的女儿”。

即使缺少故乡的记忆，凭借一块伤疤、一个胎记、头上的发旋，走失者也有了更多回家的可能。

数据的投放机制增加了这一概率。寻亲信息常常被推给相关人的同城居民、邻居、朋友和远房亲戚。最惊喜的一次，刘红涛发布了一个父亲的照片，要寻找他被拐走的儿子。父亲记得，孩子被拐走时还不到4岁。信息发出后，一个网友找过来说：“这个孩子是我。”刘红涛不相信，一个不到4岁的孩子怎么会记得父亲的样貌？但采血比对结果却证明，二人确实是父子。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秘书长乔栋向南窗记者介绍，作为一项2016年开始的公益项目，“抖音寻人”能够在走失者失踪地点周边直接推送寻人启事，并将寻人启事展示给失踪地点所在城市的头条及抖音用户，这是“抖音寻人”区别于传统寻人公益的优势所在。

一些刚刚走失不久的人，数据能很快从人海中捕捉到他们。2019年的一天上班前，外卖员洪成木刷到了今日头条上的一则寻人启事。照片里的小伙子挺帅气，他想，可惜患了精神障碍。两天后的一个晚上，他骑着送外卖的电瓶车过了一个红绿灯，刚要左拐，看见一个年轻人，大冷天穿着拖鞋，眼神有点迷茫。洪成木多瞄了他两眼，突然才意识到，年轻人长得和寻人启事里一模一样。

这是洪成木帮助的第一个走失者。后来，他一边送外卖，一边留意街上有没有寻人启事里的熟人面孔，5年来已经帮助了137人。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认知障碍、精神疾病而无法自己找回家的人。

流量也聚集起一群天南海北的网友，他们组成了寻亲路上的一环。寻亲人记得小时候吃过的一种食物，是用芭蕉叶包着扔到火堆里烤的，网友就在评论里提供线索，可能是四川宜宾，也可能是云南。一些网友了解寻亲人家乡的方言，比如在四川把“鞋子”叫成“孩子”（谐音），在江苏赣榆把满月酒说成“送祝美”（谐音）。

2020年2月，93岁的老人姚鹏娥找回了自己的老家，帮上她的就是网友的一句留言。最初，刘红涛根据老人孙女提供的信息写到，姚鹏娥13岁时被拐卖到山西，只记得老家是“河北魏县杏花营村”。很快，一个网友评论：“是不是河北威县？”

刘红涛发现，威县确实有一个“香花营村”。回家那天，村里还下着雪，村民把路上扫得干干净净，迎接老人的队伍从村口一直排到了她曾经住过的老房子。老房子已经看不出记忆中的模样了，但有一个老太太被人搀扶着走上前来，大声告诉姚鹏娥，自己是“香花”。

听到这个名字，似乎有一扇记忆的门被打开了。姚鹏娥激动地哭着抱住对方：“这就是我家啊！小时候，我们俩都是一起去捡柴火的。”

这种“奇妙”的巧合，在刘红涛的记忆里还有很多很多。他也因此常常感慨，有了技术的帮助，似乎“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

从被动到主动

技术背后，托起这些“奇迹”的，是帮助走失者回家的志愿者。

有时候，志愿者得比寻亲人更加主动。刘红涛告诉南窗记者，纠结、犹豫是寻亲人的一大特

质，“十个里面有五六个都是这样”。有人顾虑自己的寻亲信息被养家看到，有人则觉得自己没有家是件“丢人”的事，还有的寻亲者，担心自己努力也得不到回报。

志愿者要不断给他们鼓励。刘红涛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寻亲人，寻亲就是不给自己留遗憾，早一点回家，就早一点结束父母的痛苦。甘彪也常常鼓励犹豫的寻亲人，他会把过去自己帮助寻亲的成功案例转给他们，告诉他们，你也可以像这些人一样团圆。

对于一些患有认知障碍或精神疾病的走失者来说，志愿者的“主动”更为珍贵。在第一次奇迹发生之前，刘红涛可能没有帮上那个流浪老人。

因为听不懂老人的话，他原本已经驾车离开了。开出一段路，一个念头让刘红涛停下了：“他可能就是某个人的父亲。”他心里一阵难受，又马上折返了回去。

洪成木也有差点没帮上的人。2019年的一天，他在一家奶茶店取到奶茶，准备出发配送时，注意到了街上一个年轻的女生。女生神色慌张，走在路上左看看、右看看，在热闹的人群里有些显眼。洪成木有点怀疑，她可能是一个走失者。

可他没有在寻人启事里见过这个女生。洪成木犹豫了，女生穿得很时髦，白色短袖、黑色短裙，还背着小挎包——如果不是走失者，自己贸然去问，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在搭讪？洪成木不敢上前，又停车查了查当地的寻人启事，没有这个女生。他就骑车离开了。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洪成木一边吃饭一边看今日头条的新闻，一则寻人启事跳到他跟前，“和我下午看到的（女生）是一模一样的”。顾不上吃饭，洪成木马上联系家属和他们一起找人。

终于找到女生时，她坐在路边，已经走得筋疲力尽。看到家人出现，女生“哗啦啦地哭了”。洪成木也激动得流眼泪，之前，看着家属在派出所查监控，他非常难过和自责，为什么自己没有去跟女生沟通一下，“怕什么误会呢？”

刘红涛最初的那次折返，开启了他17年的寻人志愿者之路。洪成木也是在经历了一次和走失者擦肩而过之后，开始主动地去关注身边可能的走失者。

走失也意味着无人照管的危险。2016年，民政部发布的《中国老年人走失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每年全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其中走失老人的死亡率达9.78%。洪成木曾在医院ICU病房里见到一位80岁的老人，因为走失，老人在夜里出了交通事故。后来他找到老人的家属，只能拍下老人躺在ICU里的照片给他们确认，家属哭着发来一条语音：“妈呀，我受不了了。”

洪成木知道，主动上前询问一句，可能是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寻人启事里的监控录像画面让他印象深刻，画面里，那个老人坐在路边，没有人上前问他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从家属那里了解到，老人最后因为意外掉进池塘去世。

他不由得开始反思。成为外卖员之前，洪成木的工作也是在大街小巷里跑，比如帮店里送烤鱼、送快递。他想，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帮助一个走失者回家，连停下来问一句都没有过。想到过去可能有很多走失者与自己擦肩而过，“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如今，洪成木不再只是被动地留意街上的熟面孔，而是主动去观察路人。深夜独自走在路上的老人和孩子，在街上左顾右盼的路人，只要看起来像是迷路了，洪成木都会主动上前问一问。好几次，他就这样帮助走失的人找回了家人。

2024年的中秋节，刘红涛仍然每天在抖音上发布四五个寻亲视频。视频里，有一对双胞胎时隔33年终于重逢，另一对兄弟却还没被他们的父母找到。父母提供给刘红涛的照片里，两个儿子的时间似乎定格在了他们的9岁和6岁，家人还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个中秋。

爱心助餐 数智养老 ——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

近年来，国家民政部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以及《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了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民生工程，是支持居家社区养老、农村养老，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

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采用“智能烹饪设备+即烹生鲜速冻食品+数字化服务平台”的模式，助力政府部门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截至2024年底，已在全国多地建设及运营爱心食堂200余家，助餐人数突破5万，得到50多家爱心企业与2000多名爱心人士的支持，累计捐助1600多万元。

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的高岭村为例，村中2600多人，土地只有3100多亩，村中留守的老人残疾人较多，特别是老龄化程度达到21%。世界公认的深度老龄化程度为14%，高岭村高出7个百分点。残疾人有5.5%，残疾人有140多个，因此养老服务需求、助困需求就非常高。这么多老人、残疾人吃饭的问题，高岭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智翔，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向文理也很想解决，但是建一个传统的长者食堂需要二三十万的装修费用，很难落地。当两位书记碰到万德厨老年助餐解决方案



案，非常高兴，就建立起了这样的爱心食堂。

爱心食堂运营起来之后，不但使村的老人、残疾人用餐问题得到了解决，也成为了他们村连接着外界、把他们村的农产品推广给外界的一个聚合点。两位村干部带领高岭村探索推出了“美食分享+直播带货”的创新模式，并成立了高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村里的土特产进行直播售卖，进一步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

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的运营管理组织又是如何的呢？

首先是政府来主导的。中国解决养老问题一直是以民政作为主导角色，由社区和村委来运营，然后社会助力。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也是通过这种模式来落实老人助餐。

其次，这个模式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运用智能烹饪设备，免去厨师、降低人力成本，能正常活动的老人都可自主烹饪。所谓智能烹饪设备，就是把食材放进去，能自动调节时间、功率完成烹饪。其次，提供生鲜速冻食材，食材全程-18℃冷链运输以保留食品的营养，保证老人吃得健康安全；最后，实现爱心连接，是让社会上爱心组织与人士都来捐助，使运营更持续。如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广西慈善总会的支持下，广西柳州、崇左等地也建起了多家慈善爱心食堂。



另外，还解决了管理难的问题，传统食堂在采购、食材管理方面涉及复杂的管理程序，而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管理平台，能实时监测每一个食堂的助餐人数、捐赠资金去向、食品种类等，大大降低了食堂管理的难度。

那么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为什么能够推广？

它的优势在于几个方面：第一点很省钱，根据地域、规模差异，每个爱心食堂的投入成本在2-5万块，比传统的二三十万节省了大量的建设成本。第二点建设和管理成本很低，还能够动员社会发挥



力量。目前老人吃一餐只需要出2-5元，并通过“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多元筹资机制支持食堂运营。第三点很健康，烹饪没有油烟。最后助餐数据实时在线，捐款和使用管理透明，可持续运营。

以下是一些在其他地方实施的案例：在广东的爱心食堂主要是深圳对口帮扶的一些爱心食堂，截至2024年底已运营30多家。



年度企业案例



爱心助餐，数智养老新风尚——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下，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应运而生，以“智能烹饪设备+即烹生鲜速冻食品+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创新模式，为老年人提供便捷、健康的餐饮服务。该食堂已在多地建设运营200余家，覆盖村镇社区110余个，助餐人数突破5万。

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高岭村为例，万德厨爱心食堂不仅解决了留守老人、残疾人的用餐难题，还成为连接外界的桥梁，通过“美食分享+直播带货”模式，拓宽村集体经济收入。其运营由政府主导，社区、村委运营，社会助力，实现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助餐服务。

万德厨老年助餐爱心食堂的创新模式，不仅体现了社会对于老年人群体的深切关怀，更展示了数智化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工艺价值，为构建和谐社会、增进老年人福祉贡献了重要力量。



海尔生物医疗 Haier Biomedic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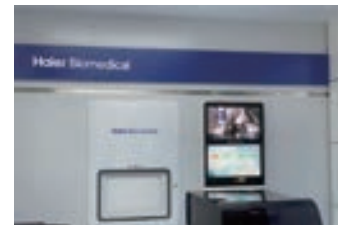
海尔智慧血液解决方案

海尔生物医疗凭借创新科技，在智慧血液管理领域取得突破。其智慧血液解决方案，融合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血液管理的智能化。

以宜昌市中心血站为例，海尔智慧血液解决方案助力其打造全国首个机器人自动出入库的血液智能存储冷库，实现了血液存储的数字化管理。

同时，该方案还实现了从采血到临床用血的全流程追溯和冷链监管，确保了血液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此外，海尔智慧血液解决方案还提升了血液管理的效率，减少了血液浪费现象。在急救用血方面，该方案能够实现零等待，为生命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



EYE 爱尔眼科 AIER EYE HOSPITAL

爱尔眼科

爱尔眼科作为全球化眼科医疗集团，通过“分级连锁”模式，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共享下沉，有效解决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同时，爱尔眼科秉持“创新驱动，科技爱尔”的发展战略，构建了医教研一体化的创新平台体系，推动了眼科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同时，爱尔眼科创新实施“交叉补贴”公益模式，将高端医疗服务利润补贴至低收入眼病患者，实现了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爱尔眼科还积极参与各项眼病救助和光明行动，累计支持公益项目700余项，实施公益救助约150万例，充分保障了低收入人群的眼健康医疗需求。



公众&公益， 表达、对话、破圈

03

书写存在

——2024南风窗公益新叙事征集

2024年，南风窗发起「公益新叙事」话题征集活动，寻找积极向公众表达自己、寻找对话空间、致力于破圈的公益组织、项目和他们的传播作品。

我们收录了7篇“故事讲述者”——将目光放在“人”本身的「公益传播故事」；

我们也收录了3个“短片共享者”——打破刻板印象、以影像加深认知的「公益短片」……

公益是小众的吗？

公益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但从个体角度看，这些问题似乎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宏观出发，“2020年我国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价值贡献的总量约为5500亿元，约占GDP的0.54%。”从2016年到2022年，约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共募集善款350亿元。2023年，中国慈善组织数量达到了13619个。尽管规模逐年增长，但在整个经济体中仍属“小众”。

然而，2023年“中国公众捐赠研究”显示，80.9%的受访者曾参与捐赠（无论捐款、物资还是志愿服务）。在线支付的便捷和多样化的参与形式使得公益不再“小众”。

怎么把“公益”传递给大众？

公益事业因高道德期望和复杂性，使公众难以快速做出判断。社会问题多样，涉及主体广泛，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各异，即使在同一问题上也有不同目标。这些复杂性使得项目实施和评估变得困难。

吊诡的是，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可能被任意评判，但公益的核心目标和影响力却常被忽视。而支持者与受益者分离，使得传统市场“用脚投票”的逻辑并不适用。

公益传播则比项目本身更难解释。项目尚有监测和评估，传播方法论却鲜有可参照的样板。南方公益分析表明，微博、微信和传统媒体是公益项目主要的传播渠道。其中，传统媒体依然重要，新媒体则综合运用了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并且，随着项目趋于“小而聚焦”，传播视角也变得更细致。

相比之下，ESG营销更引人注目。SocialBeta报告指出，线上品牌通过小程序、数字公益等方式，结合趣味体验；线下则通过多样化的触点让ESG理念直观可感。策略包括长期关注议题，递进式讨论；借势热点，联名或者进行IP合作；加入展览、快闪等多种传播工具。

ESG营销不仅形式多样，更注重在议题上的消费者沟通；支持弱势群体，关注多元议题，并邀请公众参与。

营销策略让品牌在传递ESG理念时更加得心应手。且论资金实力，公益项目更难以与企业匹敌。不过，公益行业深入了解社会议题，并对关注群体及所在环境有深厚根基，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

那么，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如何将这种能力转化为与公众的对话？

如何更好地建立与公众的对话？ 大家都爱听故事，而公益中埋藏着无数的好故事。

《“换弟”的滚烫人生》是友成基金会的好故事之一。“换弟”这个名字给了开篇足够的张力。相比讨论愿景，直接描述农村女性为何想做电商、但遇到困难，公益项目的介入又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更能打动人。

不一定每个公益故事都像英雄史诗般有巨大的转折，很多时候变化在细微之处。益微青年通过乡村夏令营支持青年成长。在《在乡村夏令营，我放下了“城里人”的privilege》中，一位二代城里人进行了自我剖析。他在乡村夏令营中看到更大的世界后，释然了对农村身份的抗拒。

找到好的故事并表达出来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写作技巧和独特素材，还有 创作者的天赋和勤勉。公益的复杂性使得呈现细节比揭露痛苦更难。

尘肺病是我国最常见和最严重的职业病之一。截至2022年底，累计报告职业性尘肺病92.6万例，约占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他们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又“何以至此”？《27岁，患了尘肺》讲述了一位90后尘肺患者及其家庭的困境与挣扎。

近20年来，中国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生率迅速上升。I See青少年心理健康慈善基金希望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但她们并非无所不能，有受限于资源条件、力所不及之处；她们的行动也并不轰烈，影响力体现在聆听与对话的、每一个微小时刻。（《阳光背后的阴影，谁来照亮？》）

文字叙事让故事卷轴徐徐展开，隐含着理性和深思的力量。而短视频、音频 等多媒体形式更容易有情感张力和视觉冲击力。

《足球少年，输了》是壹基金联合Figure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支边疆地区少年足球队，被寄予厚望但在区域比赛中失败的经历。这支30分钟的纪录片，真实地捕捉了各种情绪，远比简单的项目口号更生动。

圈”，给公益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

极端天气频发，“气候变化”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自然之友的玲珑计划通过“气候变化与农业行动者”系列故事，引导公众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理解气候变化。她们与科普大号“果壳自然”、播客“不成气候”、环境类视频号“添蓝”等合作，并主动提供线索与媒体共创故事。

春潮Springflut用参与式艺术创作邀请人们切身体验气候变化。他们发起“水上社区计划”，参与者不仅欣赏风景，还收集垃圾，并进行艺术共创。这些活动激发了更多行动。（《重走水路，一群“水上邻居”的气候行动与艺术共创》）

在春潮Springflut的案例中，很难界定这些行动是项目还是传播，但两者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好的传播依托于好的项目，好的项目也需要传播的加持。

互联网提升了公益的透明度和募款规模，但公益不只是“买断”社会问题，而是激发公众参与。当捐赠人数量和关注体量爆发，如何满足捐赠者的自我实现需求？如何回应共同价值观？如何链接对社会议题感兴趣的人？如何找到长期同行者？这不仅是传播的课题，也是公益项目的使命。

当社会议题复杂，如何在科普的基础上，再激发情感共鸣？让话题“破

“换弟”的滚烫人生

机构 | 友成基金会

作者 | 杨盈

01 她叫“换弟”

初看到这个名字时，我们以为写错了字。但和她反复确认后，她说就是这两个字。

1991年，甘肃省庄浪县仇梁村的一户人家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在这个重男轻女又贫穷的传统村落，女儿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不是欣喜，而是负担。

“送人吧！”老一辈的失望不加掩饰。妈妈有些舍不得，把她抱给了舅舅。就这样，她随了舅舅的姓，取名换弟。“换弟”成了舅舅的女儿，也成了这个家庭又一次生男孩的希望。

舅舅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家里没什么经济来源，靠着几亩地维持生计。没有多余的钱供孩子上学，懂事的换弟知道家里的情况，没有跟舅舅吵闹。

“我堂表姐他们晚上回家写作业的时候，我就趴在她们旁边看她们写字，有时候人家写过的本子和那个短的不用那种铅笔就送给我，我就拿回家描她们写过的那个字，虽然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字。”

坐在老屋堆砌的玉米前，她微笑着讲述自己的童年，眼神有些黯淡。“没读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02 胳膊卷进了机器，告别了打工生活

15岁，换弟来到村办地毯厂打工。赚了钱，给家里买了电视机，“那会没有手机，白天做地毯，晚上就看电视。看的时候，电视下面就会出现一行字，我就一直盯那个字，一边听一边看。我的记性挺好的，几年下来也认识了不少05字，只是不会写。”

家里多了一份收入，生活有了改善，换弟动了去外面闯荡的心思。2008年，她跟姐姐姐夫来到北京，在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

“本来说好1500的工资，知道我不会写字，没法写菜单的时候，就把工资降到了1000。”面对无法争辩的理由，她只能默默接受。“我不想没有文化，可我没有办法。”

几个月后，换弟辞掉火锅店的工作，跟随姐妹去新疆打工。因为有了北京的碰壁，她知道干不了好的工作，就到一家卫生纸厂做计件员。

然而，命运再次跟她开了玩笑。一次意外，她的胳膊被卷进了机器里，“当时整条胳膊被卷在里面，我抽不出也动不了。”绝望吞噬了疼痛，她没有哭。“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胳膊，但我知道，这样简单的工作，我也做不了了……”

胳膊保住了，但因为伤了筋，右手好几根手指再也无法弯曲，换弟，成了一名残疾人。

03 回乡做电商，遭遇滑铁卢

回乡以后，换弟恋爱了，因为坚持要赡养舅舅，双方起过争执，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接下来的几年，三个孩子陆续出生，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再吃自己受过的苦，她坚持托关系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自己也搬来陪读。

一次偶然的机会，换弟接触到了电商，“我没法出去挣钱，但也不想过手心向上的日子。我知道通过网络挣钱要比线下好挣，也想给孩子赚点奶粉钱。”

看到别人电商做的风生水起，换弟也想试试。她先后花了近1000元报了培训班，学习视频剪辑和带货。“后来知道培训教的那些知识，在网上一搜一大把。或者就给我们放视频，跟我们聊天，一点东西也学不到。”

在求索的路上，她做过很美的梦，也扑过很多次空，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她不断摸索直播与视频剪辑技巧，遇到不懂的，就蹲到别人直播间里学习。终于，2022年10月，她的一个视频作品终于成了爆款视频。

“播放量25万，也算一个小热门，那次陆陆续续出了1000多单。”

然而爆单的兴奋期没过，问题便接踵而来。因为做的是一件代发，厂家发货不及时及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大量的退单差评及投诉。

“因为差评投诉，我的店铺被限流了。我就想，一定要有自己的货源，不能光靠平台，你带厂家的货，具体到客户手里的是什么东西，自己根本不知道，售后都没办法处理。”

爆单的欣喜让她看到了希望，差评的打击让她找到了问题，换弟迫切的希望找到一条能解决问题的正确的路。

04 参加电商培训，学到了新知识

在困惑又迷茫的日子里，她收到了残联发来的友成基金会“香橙妈妈”项目要在县里开电商培训班的消息。培训完全免费，主要面向像换弟一样的乡村女性，希望通过电商技能的培训帮大家实现经济增收。

她马上报了名。

等待开班的日子里，她憧憬着能真正学到知识改变生活，又怀疑着“花钱的培训也没学到东西，免费的又能学到什么呢？”

报到那一天，换弟坐进了培训班的教室，她的身边是60多位与她境况相仿的残疾人姐妹。

“有一个破冰环节，班主任让我们介绍一下自己来自哪里。班里大多数都是残疾人，很多姐妹都不敢张嘴说话。我挺勇敢的，起来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但是也很紧张。”

这是换弟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言，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个与她境遇相似的群体，她们同样身体残缺，却也同样勇敢、坚韧，她们同样，都在努力挣脱命运的摆布，向往着改变。

之后的几天，换弟终于接触到了她一直想学的电商知识：“从短视频的策划、脚本的设计，到拍摄剪辑、发布……；从直播账号如何申请到产品上架、推广、直播话术……，培训的老师一边讲解，一边带着我们练习。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想学的。”在这里，换弟终于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场直播。

坐在镜头前的她，美丽而自信。

05 把自家的好苹果卖出去



随着学习的深入，换弟的电商思路逐渐打开。这几年，舅舅家的五亩地也在政府的号召下栽起了苹果树。每年能产出5-6万枚果子，但是由于没有销路，果子成熟后来不及卖掉，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中间商。“下一步，我的目标是用直播和短视频，把自家的好苹果卖出去，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在政府易地搬迁政策的支持下，换弟在县城有了一间楼房。但因为没有钱装修，家里只有床和桌

子。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卧室炉子上的中药锅在呼呼冒着热气，换弟说她的身体不太好，还在调理。这个偌大而空寂的房间里，换弟用她优秀学员获得的奖品支架，开启了又一次直播。

“平时我一有时间就开播，想先把号养起来，只要有粉丝，什么都不愁卖。”她创建起三个平台账号，取名苹果妹，拍种苹果、发苹果的视频，同时也会直播、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短短几个月，积累了近1万名粉丝。



一到周末和假期，换弟就回到村里，拍种地、拍剪枝，有时也会开播，在苹果地里跟粉丝聊天。村里人来来往往，有些会来围观，当然也有些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他们就很传统，就觉得女人家这样抛头露面不好，我就跟他们讲，直播卖苹果可以挣到钱，想让她们也来学习。”换弟一边整理苹果一边和我们说。显

然，现在她已经不会活在外人的眼里了。她无暇理会什么流言蜚语，只想迫不及待的分享自己的收获和喜悦。

舅舅家的院子里，曾经居住的老屋如今堆满了苹果袋。那是这个家庭正在摆脱贫困的印记，也是这位勤俭了一辈子的老人无法改变的生活习惯。一个个新鲜的苹果被擦拭干净，细心摆放，舅舅扯了胶带，熟练地装箱、封口，又一批苹果正在被清点、准备发货。“库里还有多少苹果，十箱还够装吗？”“够的。”“今年的苹果卖了20000多元，比去年多了一倍……”“明天嫁接了新品种，还能卖个好价钱。”



06 把希望掌握在自己手中

曾经，她的眼前是层层叠叠的大山，希望很高，未来很远。她走出去过，失去了一些，也得到了。最终她还是回到这里，在这片土地上，通过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越来越大的世界，拥有了越来越好的生活。

她是换弟，也是千千万万如她一样的乡村女性。她们普通却不平凡，在茫茫人海中、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始终不屈从命运、不放弃努力。因为她们相信，希望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必借光而行，你我亦是星辰。



编辑手记

“换弟”，一个心照不宣的名字，和她所代表的千千万万的乡村女性是这个故事的中心。

女性、乡村，都是如今公益帮扶的热点领域。相对于大大的照片和海报、动人的场景和笑脸，一个个“人”的故事，则显得更加具体。如何让局外人能够有更深切的了解，乡村女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个体，她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她们的生活重心是什么，帮助她们多做一点什么能让家庭的生活更好？

这就是这样的故事的意义。

在乡村夏令营， 我放下了“城里人”的privilege

机构 | 益微青年

作者 | 阿达

01 第二代城里人

我的祖上世代都是农村人，而我的父母通过上学、读专科，当医生，成为了家族里最早一辈的“城里人”。

小时候我胃口不好，很挑食，妈妈会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然后用一种夹杂着委屈和唏嘘的语调，和我讲述她过去在农村吃过的“苦”。或许从小听多了这样的苦难事迹，我心里总是会对自己“城里人”的身份感到庆幸。

寒暑假回到乡下，和村里长大的兄弟姐妹做伴，我也能通过对比多少感受到一种“优越感”。比如显而易见，我的穿衣打扮比他们的时髦和精致。我的普通话说得很顺溜，平翘舌音分得很清楚，他们则不习惯说普通话，说方言也会使一些我们不常用的土话。



阿达家乡旧景

由于对居住环境有自己的偏好和习惯，我很不适应农村里飞扬的尘土，随意堆砌的柴火垛，杂乱的室内环境……久而久之，我对于城乡的印象变得越来越鲜明和固定，我不喜欢甚至很排斥农村生活。

这种感受在高一那年达到顶峰，我突然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我们家从城里搬到了村里换购拆迁的社区楼房。一夜之间，我好像失去了作为“城里人”的资格。我们是白天搬的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家里大大小小的东西被装上卡车的样子。瘸了腿的沙发，和锅碗瓢盆等零碎的物件，胡乱堆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破落的景象。

新家还没有装修好，我们先搬到了同小区的一个临时租房。我无法把那里称为“家”，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皆以“过渡、凑合”为原则。那个断了腿的沙发，被用纸箱撑着。客厅除了沙发和一个吃饭的桌子，全是让人心里发空的白墙，没有接电视和网线，没有花花草草。我的房间也失去了那些有温馨回忆的小角落，仅有木头小床和小学二年级买的绿色学习桌提醒我，这是划分给我的地盘。

最让我不敢面对的，是和同学们聊起家在哪里的话题。我的高中汇聚了全县不同地方的学生，周围的人总是喜欢打听别人的家庭背景，这让我很困扰。我总想，我现在住在村里，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农村人？在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别人的看法仿佛能左右我的一切。所以我从不正面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反向搬家”这种罕见的选择。对于好面子又害羞的我而言，解释这些只会让自己显得更加局促和笨拙。

02 二次搬家

半年后，我们终于搬进装修好的新家，居住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甚至比原来城里的家还要好。我有了一个很大的新床，并且在我三番五次的请求下，妈妈带我去买了一个木书橱，从此我的书和各种小玩意也有摆放的位置了，我感到自己的心有了一个踏实的归处。

但是，我依旧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因为家不只是钢筋水泥里的一百个平方，还关系到附近的人和环境。从我二楼的房间望向外面，是一片广阔的庄稼地，天边是一排高高的行道树，比原来窗外的楼房更接近自然。但这也意味着周边缺乏娱乐和商业设施，不再有熟悉的商场、体育馆和图书馆。

回到家，我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孤岛，和周围的社区是几乎割裂的。每次在社区里遇到坐在路边的陌生长辈，他们的眼神会一直打量我，这种被盯着的感觉让我很尴尬。出于礼貌，我会微笑示意一下，然后赶紧逃上楼。

有年春节的前两天，爸爸值班，我和妈妈两人就想着去家门口的饭店解决晚饭。或许是因为临近年关，没有酒席，所以饭店生意十分冷清，整个大厅只有我和妈妈。正当我们吃得特别香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两个中年服务员的议论声：“这娘俩真是馋，就她们两个人还来饭店吃饭。”听到的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点难以置信，妈妈也有点尴尬，但我们俩都没有说话，默默地把饭吃完赶紧离开了。

生活习惯和观念的差异，就像一道小小的裂痕，冷冰冰地刻在了我的心上。所以即使换到了更好的环境，我也并没有融入农村的生活。

03 打破城乡偏见

上大学后，我回家的次数骤减，原本不太喜欢的家，也因为距离感产生了留恋之情。另外，通过身边的外省同学和朋友，我间接了解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发现原来每个人的家乡和成长经历有这

么多的不同。

本着想去看看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的初心，我加入了学校的支教社团，如愿去到了青海给乡村孩子办夏令营。那是我大学第一次震撼的远行，我看到了很多超出原有生活经验的风土人情。

当地的山脉连绵不绝，白云浓密，晚上的星星多得让我震撼。放学后送孩子们回家，单程要走一个多小时，孩子们会去摘杏子给我，告诉我搓一搓就可以直接吃。我们还被带着去看附近的湖，孩子说因为我们一起去看，所以那里被命名为“师生湖”。家家户户门口都会种一些高大的花丛，木门框上挂着有花纹的布帘。精心布置的房间，美丽的人文风光，让我感觉到当地人真实自在地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在夏令营，我认识了很多在农村长大的好朋友，他们回忆起农村的生活，和大自然

有关的童年，是那么快乐和纯粹，他们喜欢和珍视这些记忆的状态让我非常地羡慕。

这种异乡的旁观者体验，开始让我反思自己对农村的偏见。贴合自身经历反思起一些问题，我才发现在自己的认知里，城乡是二元对立的，城市比农村更好。我曾狭隘地认为，城市代表着文明，农村代表着愚昧，城市代表着整洁，农村代表着脏乱，城里人的身份意味着更体面稳定的知识型工作，做农活意味着靠体力看天吃饭……

正是由于偏见，我无法像他们一样单纯享受在农村生活的“乐”。而当这种纠结，和我认知里祖辈所扎根的乡土文明发生碰撞时，内心的斗争最终放大为对自我的抨击，使我无法接纳自己的想法，并为自己感到羞耻。



阿达在青海的随手拍

04 重新连接故土的“根”

在我大一那年，我们家终于搬回了城里。回到向往的繁华地带，熟悉的生活圈，我的挣扎终于结束了，分裂的自我再次合体，一切回归了平静。但内心深处，我其实并未从阴霾中走出。

直到最近，时隔多年再次把尘封的回忆唤醒、斟酌，我才理解和接纳了那时的自己。我曾经的痛苦，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我把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了“城里人”和

“农村人”二选一的境地。应试教育教会了我只管去攀爬成绩的金字塔，却没告诉我应该怎么定义自己，所以我才会把自己的价值绑定在这些浅薄的身份标签之上。

好在，参加“益微青年乡村夏令营项目”的经历，让我挖掘出自己的价值，并相信自己是一个可以不被单一标签所定义的人。如今的我，已经在不同的城市旅居多年，看过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终于发



阿达和支教队队友们

自内心地理解了城市和农村的多样性，理解了他们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各有所长，理解了哪怕是城市和城市之间、农村和农村之间也存在很多的差异与鸿沟。

我开始对方言里曾经视为“土”的用语津津乐道，也从姥姥家讨来一个陈旧的木头板凳做收藏，享受独自骑着自行车在家乡的小路上游荡一个下午，那一刻，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根”——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速，很多人从农村迁徙至城里，我的家庭就像是这些众生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的挣扎或许不是孤立存在的。我这个“城里人”，或许未来也可能成为“农村人”，但这些标签已经不会再束缚我了。

编辑手记

曾有一档电视综艺，试图将一个来自城市的问题少年和农村孩子互换人生，“错置”在对方原本生活的空间里，观察和考验他们对于新环境的适应性。这种戏剧化的设置，目的不在于弥合理解，而是突出矛盾，制造看点，对当事人的影响也不见得持久。

但是，在现实中的乡村夏令营，志愿者阿达通过她的真实经历向我们显示，改变确实在潜移默化地发生。

对于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长过来的这代青年，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城镇化发展，是他们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时代巨变。从乡村跨越至城市，不仅意味着人居环境和公共空间的改变，还裹挟着一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迁徙。这个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一直存在，且不断地在媒介环境中被刻画、放大，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城乡社会氛围形成的对立的生活和文化，带来了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尤其像阿达这样的“城二代”——父母是农村人，自己在城里出生和长大，这种情况下她该把自己定义为哪一边的人？如果说父母的“根”尚在农村，那么自己的“根”又在哪里？

通过把个人身份的探索，与一场走向远方、追根溯源的旅程结合，阿达对自我进行了一次冷静而锐利的“解剖”，挖出内心成见的“烂根”，重新完成认知和身份的建构。而这些细腻真挚的笔墨，或许也能为其她有着类似矛盾和困惑的年轻人提供一份贴心的参考。

27岁，患了尘肺

机构 | 大爱清尘

作者 | 大爱清尘



今年，90后尘肺患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经大爱清尘调查发现，其中的一些患者拥有着相似的看似必然的人生轨迹：成年前便早早辍学，到外地四处做工，跟随亲戚、同乡进入切割、家装行业，成家立业后，又不幸确诊尘肺病。

本文的主人公——胡合伟，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97年出生的胡合伟，命运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他比同龄人更早工作，更早结婚，更早失去亲人，更早承担家庭的重担，也更早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更早要面对死亡。

01 早熟

初二那年，胡合伟决定退学。上初中后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家和其他人的差距，他萌生了外出打工挣钱的想法。然而，

14岁的孩子几乎不可能靠自己找到工作谋生。跟随亲戚，胡合伟先去到成都的一个工厂，打磨汽车玻璃。这份工作的月薪只有微薄的七百块。胡合伟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照顾家里病弱的父亲。

为了更高的工资，他和两位老乡坐上从四川去往广州的火车。火车全程四十几个小时，胡合伟丝毫不觉得累，漫长的路途中，他满心都是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期望。到了广州，同乡们很快找到工作，胡合伟却因年龄太小，屡屡碰壁。迫不得已，胡合伟做起了临时工。但临时工的问题在于，干活不稳定，收入也就不稳定。胡合伟干了一段时间，换了几份工作，赚得少还要往家里寄钱，最后不仅没有攒下钱，反而花光了积蓄。

最穷的时候，胡合伟身上只剩下几块钱，顿顿都啃馒头。在走投无路之际，他联系了在广州打工的亲戚，随后在对方的介绍下成为石材切割厂的学徒。

所谓的切割厂，不过是个铁皮搭成的小作坊。厂里一共有六个工人，大多都是20岁左右，胡合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他们的工作是切割石材并打磨，吃住都在厂里。宿舍的床是竹编的上下铺。下雨时，雨滴落在铁皮房上，雨声被放大了几倍，渗透着铁的震颤。

做学徒工资低，跟胡合伟的第一份工作差不多，学会手艺之后独立接活挣钱，是他的全部希望。在厂里学了半年之后，胡合伟开始跟着师傅出去干活，到客户家里去安装厨房台面。学上手艺，有了收入，胡合伟心里终于安定下来。他越发觉得自己的选择并不差，生活更是充满希望。

这一刻，是他少年时代的终点，也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02 成家

胡合伟早早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只是没想到，当时的一切，还不是命运的全部。

2012年年底，老板的亲戚带着两个女孩来到福州过年。其中一个女孩只有15岁，跟胡合伟一样大。这个女孩就是他后来的妻子，韦小眉。同样残缺不幸的原生家庭，年少辍学、背井离乡打工的经历，让两个心智尚稚嫩的未成年人惺惺相惜，渐生情愫。

2014年，也就是胡合伟从事石材切割的第三年，他的儿子出生了。小胡满月时，胡合伟和韦小眉的婚礼，连同满月酒席，在胡合伟的老家举行。在这个理应喜庆、富有仪式感的日子，众人的焦点都在孩子身上。新婚的夫妇都没有穿红色的婚服，仅穿着日常的普通衣服。韦小眉还在坐月子，甚至没有给自己上妆。他们没有留下一张当时的照片。韦小眉原本是想拍一组婚纱照的。这辈子她还从来没有过梳妆打扮，穿上华美精致的裙子被人拍照的经历。她对胡合伟说：“等以后条件好了，我们去拍个婚纱照、全家福，最好再补办一个酒席。”胡合伟一一答应下来。

相较于这对格外年轻的父母，胡合伟的父亲老胡似乎才是最开心的人。他时常抱着孩子四处走动，跟亲戚们攀谈。胡合伟偶然听他念叨过一句：“孙子也见到了，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他暗笑老爸高兴得过了头，什么话都说没个忌讳。

开春，夫妇俩带着襁褓中的孩子，回到福州打工。三个月后的一天，胡合伟在干活时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从电话里得知父亲离世后，他立即放下工作，带着妻儿赶往附近县城的火车站，等到第二天才买到全程28个小时的站票。风尘仆仆地赶回家，远远看见熟悉的矮房和亲戚，胡合伟放声大哭。守夜一晚，第二天一早送老胡下葬。父亲的死，对于他来说，依旧不真实。

远处的田地里，绿盈盈的水稻已经长起来了，那是老胡生前为儿孙种下的。尘埃落定后，亲戚们帮他们把房子改了改，在房子后加盖了一个铁皮棚，卧室里做了些装修。这段时间，考虑到孩子未来的读

书问题，胡合伟想过改行，就在家附近找个工作做。可改行就要从头开始，必须熬过最初没有收入的学徒期，他已经有老婆孩子要养，没办法停下。于是，一家人再次离开四川。

其实，如果他当时咬咬牙改了行，也许人生会大不一样。但一念之差，再后悔时，一切已晚。

03 职业病

胡合伟第一次听说尘肺病，是在2019年——他有个同行得尘肺病死了。事情发生后，工人们人人自危，开始戴起口罩。胡合伟也有些害怕，却又觉得是概率问题，自己一定会成为其中之一。

2020年，胡合伟开始出现体力下降、气喘的症状。朋友们劝他去医院检查，他始终没去，一是当时不觉得严重，二是他心里知道，“一去检查肯定有病”。一天晚上，胡合伟突然发烧，剧烈咳嗽且浑身发烫。韦小眉急忙找朋友

帮忙送他去医院，医生开了退烧药，胡合伟却退烧又发烧，反复了一个星期左右。胡合伟失去意识时，韦小眉趴在他身上哭。“好像他快要死了一样。”她说。

2021年，胡合伟时常觉得呼吸急促，爬楼、搬重物都会让他喘不上气，而且他一旦感冒，就很难康复。持久的咳嗽让他觉得可疑，到医院检查后，他被诊断为尘肺三期。与妻子的震惊不同，胡合伟并不感到意外，身边确诊的工友越来越多，他早有预感，“第一反应还好……只是没想到它会这么严重。”医生建议胡合伟戒烟、改行。他带着家人回到老家广安。

第一年，他的身体还算不错，虽然不能干重活，但能正常走路。停了工作，药费、生活费都成问题。胡合伟知道，争取工伤赔偿的可能几乎为零，他对此完全不抱希望。回忆起十年的工作经历，他在一家厂里的工作时间最长也只有两年，私人小厂连合同不签，更别谈为员工买保险。

这时候，胡合伟还在试图找其他工作。2023年，胡合伟经亲戚介绍，到重庆帮宾馆开车接送客人。这期间，他的情况开始恶化，走路、说话、久坐都会喘不过气，甚至连帮人递东西都会剧烈喘息。宾馆的人起了疑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胡合伟说：“我的肺上有点问题。”之后，对方让亲戚转告，辞退了他。

再次回到家里，这次胡合伟没法再出去了。随着病情迅速恶化，身高一米七的他，现在仅88斤，整个人就是皮包骨。医生的话说得较重：“你的情况，最多（活到）三十岁多一点，除了换肺没有办法。”

这个选择不是选择。换肺意味着数十万的费用，胡合伟拿不出来。得到医生的宣判后，他回到家里对韦小眉坦诚相告。韦小眉听到他“活不了太久”时，两行清泪“唰”地从眼角滑落。



挨着胡合伟家的小径和田地

04 未卜的将来

胡合伟无法打工后，“赚钱养家”的重任便转移到韦小眉的肩上。韦小眉在茶楼里做服务员，每天一起床就出门上班，干到晚上十一点回家，倒头就睡。这样一个月下来，工资两千五，如果多卖东西能拿提成，韦小眉不善言辞、性格内向，最多只拿过三千块。

小胡在上公立小学，花费并不高，现在家里每月最大的支出就是胡合伟的药费。医生开给胡合伟的药一瓶700多块，一瓶54粒。医生建议一次吃4粒，为了省药、省钱，胡合伟一次只吃3粒，甚至吃一段时间停一段时间。韦小眉再也没提过自己想要的婚纱照、全家福和补办酒席，“以前心里是很期待的，现在感觉都无所谓了。”

胡合伟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痛苦、剧烈的咳嗽声时不时从窗户溢出来，他多数时间躺着，偶尔缓步走到家门口、小卖部坐坐，跟人聊聊天，等着小胡放学回家。这座房子没等来翻修，也没等来重建，还是跟十几年前一样。它看着胡合伟长大了，现在同样看着小胡长大。下一个十年是什么样？胡合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看到。

他和他家人的命运齿轮，还在艰难地转动。



胡在门上的涂鸦

编辑手记

作为一种由长期吸入无机矿物质粉尘引起的肺部疾病，尘肺病往往与特定的职业群体、工作环境捆绑。根据公益组织大爱清尘的官网，尘肺病在所有职业病中占比90%，农村户籍的尘肺病患者又占90%，总数至少600万人。这个惊人的数据为尘肺病患者的基本画像补充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节：患者大多来自农村，家境贫寒，为了谋生不得不投入到建筑、装修、金属开采等高危行业，却在工作中透支了健康，举家背负起沉重的医疗费用。

这些患者是当今社会中真正被忽视、被剥削的边缘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依旧在社会的角落苟延残喘，沦陷于贫穷的循环。在主流叙事中，他们的声音很少能被直接地听闻。而这正是媒体和公共组织的责任，我们需要运用自身掌握的话语权去为他们发声，让他们成为报道的叙述主体，去表达自己经历的不公与困难，从而获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救助。

命运的必然性，是一种事后建构的表象。透过这种似乎冥冥之中注定的表象，一条指向社会结构及其底层逻辑的反思路径，应当被清晰地描绘和勾勒。换言之，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将疾病视为穷人的悲剧命运，而是将疾病放置于个人、社会立足的背景，总结和剖析出一种普遍性的症候，以求统一寻找解决矛盾、改善社会的良方。

这篇文章将按照线性结构，讲述一名27岁的尘肺病患者的故事。借助此文，我们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读者对于尘肺病群体的关注，并号召读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给予这个群体多一点理解、支持和帮助。

阳光背后的阴影，谁来照亮？

机构 | 南海区慈善会-I See青少年心理健康慈善基金

作者 | 启智社工

2023年冬天，我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时，接到一通电话：“你在哪里？”

“广州呀，今天我父亲生日，我回去了。”

“我知道你害怕接电话，但是你也知道我如果打电话给你，意味着什么？”

瞬间，原来轻松的笑容凝固在脸上，沉默了两秒后，我问对方：“在哪里？现在情况怎样了？”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一般不会接到电话，但是如果接到电话，那一定是与生死相关的紧急介入。把油门踩到限速范围内的最大值，车内只有无边的沉默，内心只想往事故发生的方向赶。那个孩子，现在怎样了？

在赶去的路上再次收到信息：“孩子被救下来了，你别着急，路上注意安全。我现在跟孩子父母在沟通，等你。”紧绷的弦松了一下。然而这样的字句让我想起那些我们没能及时救下的孩子，也让我耳边瞬间响起那些孩子的声音……

“我觉得生活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不是谁都有未来的。”

“我觉得我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浪费钱，浪费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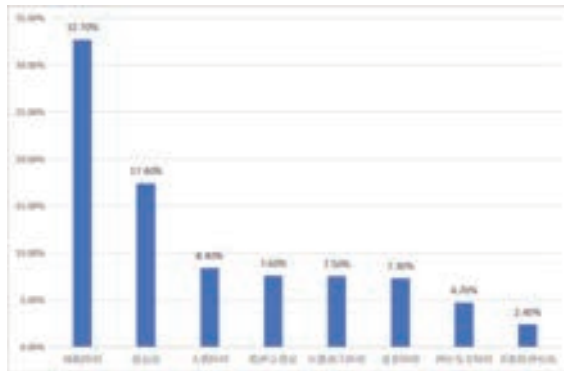


“我想不通，为什么欺负我的人都能好好的，没有受到他们应该有的惩罚？只有我躲在家里，跟个废人一样。”

“所有人都说想要帮我，但是只有我知道我的灵魂已经不存在了，只是躯壳在苟延残喘罢了。”

根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报告显示，调研中被诊断为情绪障碍的样本，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为13.41岁；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13.74岁。他们当中三成以上同时患有至少一种其他心理疾病，睡眠障碍、强迫症是最常见的共病；其中一半孩子患病时长处于1-4年之间。

由于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依然不足，加之许多抑郁症患者不愿把自己的病情宣之于口，患上抑郁症的青少年仿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身”了。唯独当我们真正去接触这个群体，去看到这些青少年的情绪，才会明白他们笑容下掩盖了自己饱受折磨的内心。



01 怎样才算爱自己

“她不太愿意跟别人交流，从她刚读初一的时候，我们知道她的情况后，我们就做了不少关心她的工作，但是她依旧不愿意跟我们说心里话。我们实在没办法，所以想看看你们可以怎么帮助到她。”学校心理老师在谈及孩子的情况时，眼神满是担忧。

2023年夏天，校园课堂里的朗朗读书声、操场上追逐打闹的笑声，与心理咨询室内的静谧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咨询师初次见面时，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是这样的微笑不像发自内心展现出来的，更像是长久以来挂在脸上的面具。

她年仅14岁，两只手臂从上到下都布满划痕。伤口的深浅不一，有一些划得的比较深的伤口在痊愈后会留下暗红色的增生疤痕。咨询师问及她的伤疤时，小姑娘大方伸出手展示：“一开始会觉得痛，但是后来看到血流出来就觉得很爽。”

学业、人际关系，以及无法选择的家庭环境，都是束缚着她的东西。而对于此刻的她来说，这些她一样都解决不了。能让她感到自己能力范围可以短暂“解决苦闷”的方式就是给自己的手腕上划上一刀。“疼痛可以让我短暂忘记掉一些烦恼的事情，虽然清醒后我需要重新面对，不过短暂忘记也是好的。”

“我知道大家都很在乎我，所以我现在还活着也是因为他们的在乎，仅此而已。”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人在乎她，她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活着，更像是她唯一能够用来回馈给身边在乎自己的人的动作。

如果要爱别人，就请先好好爱自己。

“怎样才算爱自己？怎样可以让孩子们学会爱自己？”这是I See慈善基金看到这群需要心理辅导的青少年不断思考的问题。

南海区慈善会I See青少年心理健康慈善基金（下简称：I See慈善基金）在成立之初就把目光放在那些“有苦难言”的青少年群体中。I See慈善基金以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内6-18岁心理危机或困境的青少年及其家庭为主要对象，辐射全南海区，打造南海区本土心理健康公益慈善资源与专业支持平台。



02 便捷的申请打通心灵最后一公里的距离

在I See慈善基金成立之前，发起机构之一的佛山市南海区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已运营了大沥镇在校危机学生服务项目以及大沥镇危机青少年（非在读）个案服务项目。两个项目互相补充免费个案的接案范围，一个主要服务于校内有关危机情况的学生，另一个则服务于厌学在家、长期请假在家的青少年。在开展项目工作中，咨询师总会遇到一些无可奈何的事情。

“你来看看，这个孩子的情况既不属于在校，但是请假在家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满足另外一个项目。”

“如果两个项目的接收条件都不满足，我们可能没办法接收这个孩子过来做心理辅导。”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太难了，如果真的能够拉一把，应该会比现在好很多。”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项目也有项目的接收范围。毕竟现在资源确实很有限，只能用在更紧急的孩子身上了。”

杂乱无章的家庭环境，屋子里到处摆放着各种孩子的物品，破皮掉漆的沙发，破败的房门和衣柜门，拥挤的狭小的房子——这是落在入户拜访的评估专家眼中，最深刻的记忆。



“家里三个孩子，全家就只有我有一份工作。我知道孩子有抑郁症，还试过自杀。但是我不懂这些，上班又远，下班回来也很晚了，我也想我女儿好一些，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陈同学的妈妈因长期负担家庭沉重的经济压力，头发已经长出许多白丝，面容也是憔悴的。

在得知I See慈善基金可以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后，她向I See慈善基金发起了求助，小助手及时为陈同学安排了评估，在评估完成后的第二天就建立了微信群便于后续更进一步的沟通。

这是I See慈善基金接收的首个心理求助个案。咨询师与陈同学见面两次后，意外得知她内心一直积压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情绪：“我一路走来都是坎坷的，经历过朋友的背叛、家人的忽视。现在弟弟妹妹却都是被家里偏爱的，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承受这些？我希望他们也走我这样的路，来试试这样的滋味。”咨询师认真倾听，接纳她所有的负面情绪，给予她情感上的抱持。

如同许多得知自己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一样，她也会对“为什么患病的是我，而不是别人”有着很深的刨根执念。在她眼里，自己足够忍耐、懂事，哪怕在面对班上其他同学的孤立和嘲笑，也没有选择爆发情绪去伤害别人。

但是也恰恰是如此懂事的她，被抑郁症找上了。

“我没有选择，只能承受在我身上的一切，哪怕我认为自己已经承受不了了。”

在一次舞蹈考核中，她获得了“优秀学员”的称号，这也是她为数不多的闪亮时刻之一。刚拿到奖状时，她内心充满了喜悦。但当她发现班上其他参与了舞蹈考核的同学也拿到了同样的称号，心中的喜悦不足三秒便被冷水泼灭。咨询师慢慢听着她描述自己的感受，然后回应：“看来优秀的人也会吸引一群优秀的小伙伴。”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愣了一会，紧接着露出笑容。原来优秀，也是可以一起获得的，别人也获

得优秀并不代表获得优秀的自己“不过如此”。

四个月的陪伴，咨询师看着她从一开始的茫然、拘束和无措逐渐变成现在充满活力的模样。现在的她与家人相处时能够逐渐感受到奶奶对家庭的付出，妈妈对自己兴趣爱好的支持，弟弟妹妹对自己的依赖和爱。

她摆脱了刻板的受害者思维，逐渐学会调适自身的情绪状态，再也没有萌生过自杀的念头。面对自己暂时还看不清的未来，她也开始设定自己的目标：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努力练习，获得上舞台独舞表演的机会，哪怕这个过程很漫长、很辛苦也没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个像她们一样的青少年尚未被看见。TA们只能躲在夜晚的房间内独自啜泣，在内心尖叫呐喊，然而第二天擦干眼泪重新戴上面具，继续假装若无其事地生存着。

对于这些容易陷入危机的青少年，除了治疗，更需要做的是提前预防。除了心理辅导外，I See慈善基金也注重去到不同的学校进行心理健康倡导活动，从“预防-发现-心理辅导”形成闭环工作。

在后续的工作中，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机构加入到I See慈善基金定点辅导站合作计划中，让更多家境困难无力支付心理咨询费又存在心理危机的青少年得到更便捷的心理服务。

本文所涉及的个案姓名均为化名。



编辑手记

从《小欢喜》到《深海》，近些年来，我们在影视作品看到了不少被抑郁症所困的青少年角色。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正在唤起社会的更多关注，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很多默默承认着心理健康疾病的青少年在无人的暗处独自伤身，且不知如何求助。这种“隐身”状态源于社会对心理健康的认知不足、患者自身病耻感的存在，以及家长、学校对青少年情绪问题的误解。

如何帮助这些青少年，I See慈善基金所描绘的案例给了我们一个朴实无华的参考：建立心理辅导闭环服务、提供便捷的心理咨询支持、提供针对性的个案支持、整合公益资源。

此外，我们还能从中学到重要的一点——帮助陷入心理困境的青少年，不仅仅是心理咨询师的責任，更是全社会的責任。

足球少年，输了

机构 | 壹基金

作者 | FIGURE

很少有纪录片会讲述一个关于“输”的故事。

但是，在壹基金联合Figure拍摄的纪录片《比赛有输赢，但足球没有》里，镜头“赤裸裸”地向我们曝露了竞技体育的莫测和残酷：2023年的夏天，一支由边疆地区少年组成的足球强队，在区域比赛中“大败而归”。

在这个并不令人愉悦和热血沸腾的故事里，赛场溃败、球队被淘汰、球员沮丧而压抑的情绪……构成了纪录片的大部分内容。然而正是通过这些片段，一幅关于边疆足球少年的真实画卷在观众的面前展开，让我们直接地感受到足球这门运动的独特魅力，和它在这些少年生活中点亮的的光芒。





01 赢与输

7月7日，纪录片团队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旅程。两天后，“2023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暨新疆建设兵团校园足球总决赛”将在塔里木地区的阿拉尔市举办，86支球队将在此共同角逐参与全国联赛的名额。

在这次大规模赛事中，八师U12男队（隶属石河子市），是一支亮眼的明星球队，也是其所在组别的夺冠热门。球队的底气不仅来自于石河子地区优良的校园足球传统，更来自于他们的主教练。被称为“冠军教练”的张楠曾多次率队取得地区联赛的冠军，而此次他带来的16名球队成员，是从石河子三所小学中层层选拔、优中选精来的。

初见张楠，是在阿拉尔市的火车站外。球队从石河子坐了一夜火车赶来，见面后张楠主动地和我们的导演打招呼，其他小球员则自顾自地聊天、打闹，显得很亢奋。此时此刻，球队里的每个人都是乐观和自信的，甚至在抽签结果出来之后，和上一

届的冠军十师队、季军五师队同被分到“死亡之组”的坏消息，似乎也没有特别影响他们的心情。

在张楠的预想里，球队在小组赛唯一的对手，只有去年从他们手上抢走冠军的十师队。因此，他给队员们打气道：“小组赛能拿下十师，冠军基本就稳了。”

然而第一场小组赛中，尽管在面对身体条件占据绝对优势的十师球员时，八师队在士气上不甘落后，采取硬碰硬的进攻战术，结果却是他们遭遇了一场“0:7”的惨败。一场失利虽不可怕，但对于球员来说，被宿敌踢成“0:7”却是不折不扣的羞辱。小球员们的心态彻底崩溃，几名主力被换下场后就抑制不住地痛哭。

经验丰富的教练希望这场大败可以更好地激发起孩子们的斗志：“明天的比赛踢出血性来，都是男孩子。”结果，竞技体育再次展示了它残酷的一面。还未从昨日的失利中调整过来的球员们，场上表现大失水准，再次以大比分败给了过去的手下败将五师队。连输两场，球队出线的希望已然渺茫。

面对这个结果，张楠比队员们更加沮丧和愤怒。比起难看的比赛成绩可能会使自己失去“冠军教练”的光环，真正让他感到“恼火”的是，孩子们在输球不到一个多小时后，就好像已经忘记了这回事，恢复了嘻嘻哈哈、没心没肺的样子。聊到输球，还出现了互相推诿责任或归咎于球场条件不好的迹象。

他意识到：这些孩子太过年轻，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失败。比输球更可怕的，其实是输球之后就轻易放弃的态度。于是，这位前一天还在努力激励球员、把输球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的教练，冲孩子们发火了。



02 爱与恨

带着队伍出来比赛这些天，张楠每天都在忙于料理队员们的生活细节，照顾生病的孩子，一遍遍叮嘱感冒的孩子不能喝冷水……可谓是“又当爹又当妈”。队伍里有位小球员，从6、7岁开始跟着张楠踢球，洗袜子都是他手把手教的。对孩子们来说，张楠是他们的教练，又如同他们的家长。正因为对这些孩子爱之深，张楠才会把球队的成绩看得格外重要，才会在第二场比赛之后对球员们发了火。

从第三场比赛开始，张楠宣布让主力球员全部转为“后勤人员”，替补球员上场比赛。在比赛中，替补球员们球风硬朗、气势如虹，可惜经验不足的他们在点球大战中败给了对手。比赛后，张楠把近乎崩溃的情绪隐藏在平静的外表下，热情地鼓励了这些拼尽全力的球员。

那天晚上，几个球队的教练聚在一起喝酒、闲聊。从他们的谈话中，导演辛雯了解到，在当地担任足球教练，几乎都是正职以外的义务劳动，没有奖金和补贴，还经常需要垫钱带球队出来比赛。由于各方面条件和资源的限制，边疆地区校园足球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如：基础设施欠缺、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内容单一和方法陈旧等问题，导致当地校园难以形成浓厚的足球文化氛围和系统性的足球训练体系。

在此背景下，为什么这些有家有业、生活不易的中年男人还在坚持着这份教练工作？他们的答案是一样的：因为孩子们需要足球、需要体育。无论比赛输赢，足球都会给这群少年带去一段闪亮的日子。无论他们未来走向何处，这些日子都会像一束光，照耀他们往后的人生。

作为教练的张楠，总是想把足球带进更多孩子的世界。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前，他带着队员们的去给八师女足队比赛加油助威。之后回到队内，他们一起总结失败教训，思考足球带给自己的收获，也一起“没心没肺”地玩乐。

那一天，所有人压抑已久的情绪都在绚烂的花火中释放出来。看着烟花在孩子们的手中绽放，映出他们天真而无忧的笑容，辛雯心中一个长久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足球究竟会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什么？

或许，在球场上收获的输赢和悲欢，与教练爱恨交织的情感，彼此间真挚的友情，肆意的青春……



一切加起来，便是足球对他们的意义。

最后一场小组赛，球员们终于放下包袱。这时候，出线结果已经毫无意义，但所有人全力以赴地用一场迟到的酣畅淋漓的胜利，证明了自身真正的实力，结束了今年的兵团赛之旅。

如果足球是照进少年们生命里的一束光，赢球的这一刻，绽放的光芒便是最耀眼的。学会了面对失败，也永不放弃对赢的渴望和拼搏——这是此次阿拉尔比赛给这些石河子男孩的最后一课。

03 尘与晨

兵团赛结束后，纪录片团队跟随球队一同返回了石河子市。这座城市给来自江南水乡的导演阿蛟的第一印象是：尘土多到夸张，出一趟门手机上就蒙了一层灰，道路两旁的树也灰灰的。

小球员“铁头”的家在一条泥泞不堪的小路尽头，路边都是枯树，还有一些野狗，显得十分凋敝。从灰暗的房子里走出来的铁头，身上也沾着一些灰尘，和球场上那个敏捷的、神采飞扬、发着光的维族少年几乎判若两人。

在那个瞬间，辛雯突然理解了教练们的良苦用心。借助足球这门运动，去遥远的地方看未知的世界，在更大的舞台上尽情挥洒汗水、展现自我，是这些边疆少年生命中一段难得的珍贵经历。

除了教练，以壹基金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也在帮助孩子们圆梦球场上发挥着重要贡献。通过建球场、配备体育器材、培训体育教师、组球队和打比赛这些硬件和软件支持，帮助儿童在快乐运动中启发潜能、全面发展，是「壹基金乡村儿童足球项目」的核心理念之一。参与项目的志愿者表示，希望每一个儿童，不管城市还是乡村的孩子，能用在体育运动里学到的东西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好的人生。

对于八师U12的球员来说，本次兵团赛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踢球。明年，他们中的有些人将会升入初中，有些人可能会在选拔中落选，他们的命运终将分道扬镳。



被问到人生理想，小铁头不像其他伙伴那样志存高远，憧憬未来考上重点大学、进入国家队、成为世界级球星。他更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像踢球时那样不知疲倦的奔跑，把年轻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这里少一些尘土、多一些光彩。

如张楠说的，石河子是一座建在戈壁滩上的城市。一代又一代的兵团人像戈壁滩上的胡杨一样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筑造了这座城市。而当这些孩子长大，他们也将成为扎根于这座城市成为地基和支柱，那时再回首起这段热血的足球经历，他们一定仍会感到弥足珍贵。

编辑手记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由教育部联合中国足协成立。每年的七至九月，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年龄段的校园球队，都会全心投入到这一比赛中，角逐从本赛区晋级全国赛事的名额，以争夺更高的荣誉。

今年，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已经举办至第三届。观察各届赛事、各个年龄组的全国24强名单，我们几乎无法从中看见一支新疆的队伍。以新出炉的2024届男子高中U17组24强为例，占据8强的队伍分别来自上海、吉林、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其中上海和广州都有两支队伍。而整份名单中，也仅有一支队伍——留坝县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来自西北地区。

联赛中所有参赛队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由专业足球俱乐部打造的队伍，一种是由学校自行选拔、组建的校队。相比之下，前者拥有更成熟的投资、管理和运营模式，相应地也配有更完善的训练设施、场所和体系。后者的训练主要在校园内进行，因此学校本身拥有的教练、场地等硬件和软件是分化队伍实力的重要因素。

一场足球联赛的成绩，客观地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的差距。而进一步溯源，一个地方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则由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只有理解这点，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边远地区的足球教育建设不易，为什么这些边疆足球少年在面对其他地区的强敌时“节节败退”，为什么“足球”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希望和机会，继而思考如何能把足球文化输往边远地区，帮助其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培养出更多足球人才。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教育公平的畅想，更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的强国使命。

菌子都旱没了！吃货哭了，而她决定做点什么……

机构 | 自然之友

作者 | 麦麦（果壳自然）

最近几年，春季干旱在云南越发成为常态。在距离昆明主城区约50公里的黑泥沟村，靠天吃饭的农妇们更是难捱——她们靠种地和捡野生菌为生，这两年气候不好，不仅田里收成差，就连野生菌都越来越少，冬天最能卖钱的松露也很难找到。

收入明显减少了；对此，农妇只是说：我们老农民只能靠天吃饭，听天由命。听到这句话，王莹心酸又无奈。王莹，一昆明人，过去十几年一直致力于云南的农村公益事业，专注于服务云南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儿童，小农女性是她格外关注的群体。



据国务院2015年的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女性占了70%。尽管女性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但与男性相比她们更边缘化——收入更低，土地的权属保障不足，没有足够的培训，还必须适应男性化的技术设计。

王莹的感受也是如此。在她接触的云南农村，男性大多外出务工，村里的田地就交由女性劳作。这些农村妇女大多没有上过学，有的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不敢与陌生人打交道，也不太与男性交流。那些针对男性的农业帮扶项目对她们用处不大。王莹想帮她们。

01 脆弱的女性小农

黑泥沟村正是王莹服务的社区之一。这是一个苗族村寨，过去一直种烤烟。烤烟并非指香烟的加工工艺，而是烟草的一个类型，也被称为弗吉尼亚烟草。烤烟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烟草类型，但其种植过程相当费水，对土地的伤害也很大。为了保护水源地，当地政府最近几年开始限制黑泥沟村的烤烟种植。



由于干旱，每家的田地边都堆着大量用于灌溉的水管 | 供图：王莹

不能种烤烟，村民们只好种回玉米。但这几年干旱天气频发，不仅影响耕种进度，玉米和蔬菜也长得慢；干旱过后暴雨一来，没长好的土豆和红薯又烂在地里。气温升高，农田里的杂草长得快，害虫也多，还出现了一些她们从未见过的害虫，农药越用越多。因为缺水，农民们还需要花钱购置皮管和储水桶，自己到镇上拉水；为了防止水分蒸发，他们还得增加地膜的覆盖量，免得作物被晒死……收成没见好，开销却是增加了不少。

气候变化引发粮食危机，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在这里窥见一斑。全球变暖被认为是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成因之一，而且未来的极端天气现象可能还会增加。热浪、干旱、洪水等问题都正导致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下降，病虫害可能因气候变化而增加，土壤也可能因此更脆弱。

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极端天气就像悬在头上随时都会劈下来的一把利剑。而在这把利剑之下，缺乏足够保障的小农经济愈加脆弱。

当和黑泥沟村的村民聊起气候变差的话题，一个农妇说，可能是因为她们最近几年用了太多的农药，伤害了土地和自然，所以老天在惩罚她们。这是气候报告之外的另一面世界——没有全球性的宏大叙事，没有复杂的数据和模型，一个质朴和纯粹的世界，但田地里的作物和每一位农民都是直接承受者。

02 她们，和生态友好型农耕

王莹想跟黑泥沟村的农妇们一起做点什么，但气候变化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再加上要开展新项目，资金也是难题。不过，去年4月，王莹参加了自然之友举办的玲珑计划，通过这个计划联系上了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乔玉辉。有了这位资深的专业导师加持，王莹拟出了一份详尽、有底气的计划——在黑泥沟村实践“生态友好型农耕”，并且通过一轮轮烧脑的答辩获得了项目资助。

生态友好型农耕是一种可持续农业的耕作方式。通过种植耐热型、耐旱型、氮高效型等优良作物，提高农业对极端气候的抵御能力；同时更新耕种方式，管理土壤肥力。这种农耕方式反过来还可以减缓全球变暖，因为有了改进肥料的使用、增加土壤碳封存、进行间作及推广农林业和保护性农业等这些举措。

具体做法因地区而异，而在更深的了解下，王莹发现对黑泥沟村而言，解决方案藏于传统农作中。黑泥沟村是苗族村寨，寨子里的人有保留老种子的传统。这些老品种的土豆、苦荞、雪莲果，经过几百年的优胜劣汰，具有良好的抗旱性，不需要太多水和人工干预就能长得好。

接下来，王莹在黑泥沟村组建了一个女性行动小组。她找来专家张梅为农妇们进行种植培训——张梅有20年耕种经验，又接受过农学专业大学教育；更重要的是，同为女性，她与农妇们的沟通隔阂更少，可以快速建立信任关系。

在多次讨论后，张梅鼓励大家在地里多种植不同的作物：作为主要口粮的玉米和小麦还是照常种，同时腾出一两亩地转种青稞和苦荞，应对干旱带来的减产风险，还能增加自己的食物多样性。村民们还在山地上进行间种和套种，在比较小的板栗树下种了辣椒、芋头、土豆，在玉米旁种了魔芋和洋姜。

女性行动小组在张梅的指导下，一起设计耕种计划，一起下到田间。王莹很快发现，这种“教”并不止是单向的——这些农妇们都有着15年以上的耕种经验，她们只是缺乏科学上的系统知识，但本身都已经是种地的专家。

理念和现实的冲突接踵而至。随着气候变暖，当地的虫害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从未见过的害虫。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妇们来说，不断学习新的病虫害防治知识并不容易，她们能做的只有用更多农药——在她们看来，不使用农药化肥是不可能有的收成。

后来，王莹和张梅终于找到了办法：用胡椒水或烟叶水浇灌农田——作为天然杀虫剂，



组建女性行动小组，讨论她们的需求 | 供图：王莹



到农田里指导种植 | 供图：王莹

同时还可以保持泥土中的水分。同时，王莹还为小组进行了女性健康培训，告诉她们农药对身体的伤害。毕竟对很多终日劳作的女性来说，关注自己的健康，往往是一种奢侈品。

去年春天，云南经历了自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气象干旱。持续干旱影响了原本的种植计划，更让大家对收成非常担忧。王莹和张梅只好办多几次培训活动，不断收成员们的新问题，帮她们找到应对的方法。

一年下来，生态友好型的种植方式确实为农户们带来了好处，不仅产量得到保证，还有增收的苗头。减少农药、改种老品种的作物，也让农户们节省了金钱和精力。王莹还从城市邀请了一些消费者到黑泥沟村，为消费者和农户建立直接的联系。



去年9月到田里进行种植监测时，情况很不错 | 供图：王莹



最开始大家还比较拘谨，后来气氛越来越好 | 供图：王莹

03 更好地留在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

在一系列活动中，最让王莹感慨的是农妇们的变化。最开始办活动时，她需要逐个联系农妇；但很快，成员们主动提出帮她联系其他人，甚至还主动邀请她多来办活动。来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大家不仅带来水果零食一起分享，还主动在培训时跳舞。她们从被动接受安排的人，逐渐成为主动参与活动的人。

在王莹看来，这是因为农妇们对自身的关注变多了。对她们来说，参加培训、学知识也是一种放松，可以从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暂时得到解放。另一方面，收成变好、收入增加，她们不仅能掌握多一些家庭经济的主导权，更对生活有了盼头。

这些生态友好型的种植也逐渐传到其他村寨。苗族村寨之间很多都是亲戚，经验口口相传，很快在其他村也流传开来。遇到村民们自己解答不了的问题，他们还会请王莹再去培训。女性小组的成员们还主动提出新的需求，例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健康的知



进行气候变化培训 | 供图：王莹

识，希望王莹她们为村里的孩子进行培训，让小朋友也知多一点。她们未必知道这就是绿色的种子在悄悄扎根，但最可贵的改变就在这样的润物无声中发生了。

依照王莹提交给玲珑计划的项目书，这个项目原本只计划进行到去年9月。但与黑泥沟村农妇们的交流已经从项目变成日常，培训的内容也越来越多。王莹给农妇们进行过家庭理财的培训，后来又带农妇们一起做雪花酥、棉花糖——对于农妇们来说，她们希望可以拥有更多的谋生技能，留在世代生活的土地上，而不必到大城市租房打零工。

编辑手记

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气候变化”这一术语逐渐为公众所熟知，尽管它已变得耳熟能详，却仍像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气候变化究竟是什么？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自然之友的公民气候行动计划——玲珑计划，用跨界的方式寻找生活中与气候变化紧密相连又愿意行动的人。

原文发表于“果壳自然”，属于“气候变化与农业行动者”系列。文章以吃货的视角，用“菌子干旱，吃货落泪”的标题吸引读者注意。文章背后揭示的是女性小农的困境——在极端天气的影响下，依赖天气的农业让小农经济更加艰难；男性外出务工，留下女性承担家庭和农田的责任。如何构建女性社区，共同面对现实挑战，从传统中寻找新的、环境友好的解决方案，甚至找到生活的主导权，文章呈现了一种解法。除此之外，这个系列还与气候变化垂类头部播客“不成气候”、环境/生态垂类视频号“添蓝”进行了合作。

尽管公益组织的专业议题破圈一直是业内多数人的疑惑，但他们找到了与媒体相向而行、共创故事的一种解法。

重走水路，一群“水上邻居”的气候行动与艺术共创

机构 | “粤港澳大湾区气候行动小额资助计划”

作者 | 千禾社区基金会

2024年5月11日，在接连的骤雨之后，广州海珠湿地水域终于迎来短暂的放晴。一艘载着青年人的大桨板徐徐在林荫下的水道穿行，不时传来惊喜的叫喊声。从岸边的过客，转而成为水上行者，视角的转换让大家看到许多平时不曾留意过的景致，带来一个个新奇的体验和发现。

有参加者惊叹道，“每段航程的地理景观和体验都不一样。深入海珠湿地后还能见到许多野生鸟类和植物：斑嘴鸭、夜鹭、鹊鸂、白鹭苍鹭、乌鸫、暗绿绣眼、莲雾、蒲桃、黄皮、番石榴、荔枝、甘蔗、香蕉，让人发自内心地觉得必须好好珍惜我们的生态系统。”





这是春潮Springflut“水上社区计划”的一场活动。在广州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泛舟碧波上的水乡生活早已远离人们的视野。该计划召唤海珠湿地附近的居民一起划桨板，在水上观鸟、摄影、寻“宝”创作……

01 “我们练习走水路，成为两栖动物”

春潮Springflut是一家用参与式艺术厘清与回应社会议题的创意工作室。一直以来，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全球性系统性问题，常常因其过于宏大让人望而却步。他们希望用轻松、好玩且门槛低方式，邀请人们走进来，有了切身体悟后，进而从参与者转变为行动者。

主理人CaiCai和大雁是居住在小洲村（广州市海珠区的一个传统村落、岭南水乡）的新村民。几年前的一次桨板体验激发了他们对水上世界的探索热情。

“珠三角本就是一个水域发达、水系互通的地方，在过去水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繁荣，水上生活也很丰富。但随着城市化发展，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人们来说早已很陌生，大家习惯了走陆路，不再认为水是一条路，也就放弃了一种探索的空间。”

他们的好友李铁四是一位桨板教练员，每天和水打交道。他对海珠湿地水域有直接性的体悟，会经常分享这几年观察到的水位变化和垃圾情况。由此为灵感，CaiCai和大雁希望把可持续的理念融合到对水上运动的想象之中。他们商量着，能不能链接到一些生活在海珠湿地附近的居民、大学生、桨板学员、户外爱好者等，从多元的视角、不同的生命经验出发，让社会议题的讨论嵌入到桨板活动中。

恰逢今年上半年，广东遭遇气候变化之下的强对流天气与长时间降雨。在“粤港澳大湾区气候行动小额资助计划”的支持下，春潮Springflut发起“水上社区计划”，以桨板作为探索水上社区、生态的工具，和招募到的“水上邻居”用身体去感知在连续极端天气下，城市中央的海珠湿地正在遭遇什么，周边的自然环境、气候生态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他们邀请李铁四作为技术支持，参与项目的桨板教学和安全保障。

五六月期间，“水上社区计划”共发起3场活动。

02 “别人制造垃圾，我们用垃圾创造”

第一次划桨板的路线，从小洲生活区开始，途经海珠湿地三期和污水处理厂，全长2公里。参加者除了欣赏沿途的风景，还要收集停靠在岸边、漂浮在水面的垃圾。大家惊叹于这么漂亮的地方也有很多垃圾，即便投入大量社会资源做水治理，即使每天有那么多环卫工人在付出劳动，垃圾依然存在。

“第一段水路靠近居民区，水比较浑浊，水面也有很多漂浮的水草和少量的垃圾。第二段水路在

湿地公园范围内，水质不错，能看到了水下成群的鱼和水底的垃圾。我们发现埋藏在水底属于这片水域的历史：见证着渔民上岸的沉船，湿地未征收前果园的农药包装袋，掀起短暂共享经济热潮的共享单车，伴随河边餐厅消亡的炖盅、餐具、蹲坑。”CaiCai细数着伙伴们潜入水中寻得的“宝”和历史。

大家把收集到这些在不同年代被丢弃到水中的垃圾送到岸边，由大雁带领进行艺术共创，一起打造1m³的“海珠湿地宝藏”再造展览。生锈了的共享单车，有点臭也很丑，给它上色后，有人说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还原美貌》，后来有人提议说《还我押金》。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在思考环境问题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活动结束后，很多人会把照片发到朋友圈或小红书，讨论垃圾到底从哪里来，我们每天

生产那么多垃圾，可以怎么做才能减少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03 “在水上，我们看到被折叠的广州”

“水上社区计划”之所以选择海珠湿地水域作为集结地，不仅因为湿地生态与气候变化的强关联性，还因为这里既保留着岭南水乡的河涌风貌，有古村落也有城中村，位于城市公园的边缘也毗邻世界工厂。经过第一次的集体探索，CaiCai和大雁认为，事实上的海珠水域更复杂，应该更加打开做泛海珠湿地的水上田野观察。

第二次的水上活动从小洲村到土华村，全长8公里。一路上，从果树野地、人造湿地、污水处理厂、水边的城市建设工地、小学、居民生活区到服装制衣厂，城市的肌理显露于水波中。丰富的景观变化像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印证着广州的城市变迁，给人一种“广州折叠”的感觉。

有参加者感慨道，“在河涌连接的各个角落，不时偶遇榕树下打牌的阿公阿婆、水路演习的消防员、工种细分的制衣厂、撒网捕鱼的人、课间休息透过栏杆好奇张望的小学生、居民们晾在岸边花花绿绿的被子、村民在附近的自留地耕种、家庭作坊、水厂、消防基地……让人感受到这片水系对不同生活形态的承载力。”



大桨板吸引了岸边人们的目光，大家互相观察，交谈也自然而然发生。尽管人们不再像老一辈那样跟水域有频繁的互动，但现今在水上还能看到本地的生活传统。正值端午过后，在小洲村果园的水边，几位阿叔正在埋龙船。他们说村里会划龙船的人越来越少了，还严肃地提醒桨板上的小朋友要当心，“欺山莫欺水”。对于水，他们亲近又敬畏。

大家用摄像头捕捉观察到的事物，回到岸上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思。这些收集到照片，被加上文字，成为水上社区1m³展览的水上摄影展，让人们通过图像看到水上社区的真实情况。

04 “气候变化本身是个交叉议题”

第三次的活动是参观水上社区1m³展览。展览的logo墙是从桨板基地菠萝蜜树修剪下来的树枝拼接而成，横幅来自工厂的边角料，树叶是CaiCai在菜园里收集到的果树树叶、艾草、紫苏。活动当天，因为连续的降水，摄影展照片上的文字有的消失了，一些粘贴在一起的物件被分开了。这个探讨气候变化的展览本身也在不断受气候、风吹日晒的影响。

就像展览所传递的气候信息一样，“水上社区计划”对气候变化议题的讨论也是自然发生的。

在CaiCai看来，气候变化不是环境污染等单一因素形成，而是很多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的，要看到它跟其他议题的交叉性。她认为，公共传播要突破影响的圈层，实现跨领域倡导，需要讨论的话题足够交叉、足够多元，才有可能形成社区。

春潮Springflut回应社会议题的方式，是自己把爱玩和关注的事情纳入工作中，去创造更多可能性，让参与者了解到议题当中的复杂性，梳理出跟个人工作和生活结合的思路，而不是停留在对宏大议题的讨论上。

CaiCai觉得，与参与者们共探索海珠湿地水域，是在营造自由的环境。这个过程没有权威专家，也不是正儿八经地探讨严肃议题和学习知识，而是通过微小的事物一起学习和交流。就比如这种植物为什么会生活在这里，需要怎样的生存环境？这类鸟为什么会选择来这里？当桨板划过工厂时，大家为何会不由加快速度？为什么看起来很干净的水域会有这么多垃圾？为什么有些地方的草都枯黄了？



除草剂的频繁使用，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参加者们在水上看到立体的广州的一个切面，从这些小细节里去感知，反思个人生活行为。

05 “做了就是行动，鼓励参与者成为行动者”

虽然活动的时间并不长，但更重要的是启发大家将在户外活动中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敏感度带回生活中去。譬如，在发现水

上的情况是这样之后，可以做什么？他们建立了微信群组，作为水上社区的雏形，也从参与者中发掘积极的行动者，鼓励更多的人去行动、去传播：

在小洲村长大的参与者想通过社区调研和地图去深入了解小洲的社区现况，而探索水域的情况已经成为她计划的一部分；

做生态产品的伙伴从水上运动、水生植物获得灵感，她结合环保材料，将水草元素融入自己的产品设计中；

从事摄影的参与者自发制作“水上社区计划”短视频进行传播，并带领孩子参与气候行动；

来自教育行业的参与者把活动分享给学生，有的用音乐表达对气候变化的思考，有的带领学生参观污水处理厂；

关注可持续和生态议题的高中生参与者向同学分享他观察到的情况，将之纳入自己的创作中。

“水上社区计划”让春潮Springflut看到通过搭建水上社区推动议题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从更大的地域范围来看，海珠湿地从属于珠江水系，水上社区或许可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像水一样流动。这样一来，这个“水上社区”就有更大的吸纳性，吸引更多依水而居、跟水有很多联系或对水域感兴趣的伙伴，将自己关心的议题带进来，链接到多元背景伙伴，在不同水域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

编辑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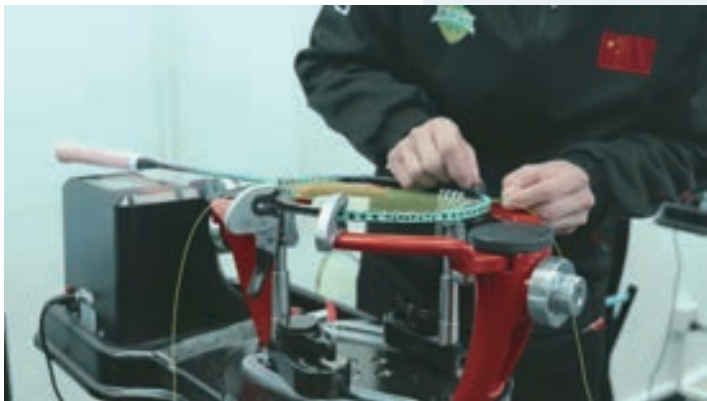
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缺的存在。然而，我们却鲜少“真正地”关心水的问题。我们身边的水域有哪些？这些水域在哪些方面与我们息息相关？这些水域有否受到污染？

一份详尽的环境检测报告，可能不足以引起你的兴趣，但一场的水上运动，却能吸引你亲自走进现场。“水上社区计划”不仅提升了参与者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现状的真实感知，还鼓励人们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将桨板运动中的感悟转化为可玩的运动与可视的展览。

春潮Springflut让我们看到，公益可以很潮很好玩。通过艺术共创和社区参与，项目成功地将环境问题与个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激发了社区成员的参与热情和创造力，为社会议题的讨论和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动力。

未来，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样小而美的新奇项目，鼓励更多人参与关于“身边”的公共议题——就如“水上社区计划”所倡导的，以自己为方法，从细微处进入，把宏大的议题转化为可触及的附近。

故事短片年度推荐



《穿线师》

机构 | 青芽运动

浦东新区辅读学校主要是培养心智障碍孩子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一次偶然的机，校长王英把这两个孩子推荐去学习了羽毛球拍的穿线技能。

普通人很快完成一个球拍的穿线，但对于心智障碍的孩子们而言，他们就需要反反复复地训练才能完成一个基本的打结动作。归功于孩子们不懈的努力，今年3月，穿线工作室首次实现了盈利。截至4月底，他们共穿拍2176支。

一个心智障碍患者走向社会、拥有一份工作，这是家庭、学校、社会联合支持的结果。



《社工的100种可能》

机构 | 社工客

能成为一名社工，那绝对是一名六边形战士！

社工在日常生活中，承担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超多功能：能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专业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推动者；是社会调研者；还可以是倡导者、管理者、资源争取者……100种可能，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社工做不到。

总之，社会工作者的可能性非常广泛，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和职责中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

《榕江足球》

机构 | 成都微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踢足球，可不只是男孩的爱好！

因“村超”出圈的榕江，这里的足球女孩也同样在绿茵场上生龙活虎。

“撒开脚丫一黔东南州少数民族女子运动发展项目”通过持续发挥榕江足球精神，组建榕江县校园女子足球队，鼓励少数民族女性肆意奔跑起来，提升女孩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意识。

让女孩们能够一直撒开脚丫奔跑！通过影片你可以看到她们的内在动力，看见她们可以超越的界限。



2024社会创新大会传播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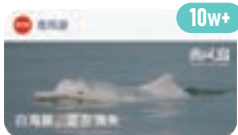
话题专栏深度聚焦



微博话题 #南窗社会创新大会#

3000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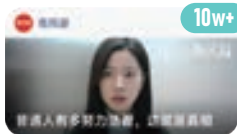
累计阅读量



公众号专题 #2024南窗社会创新大会

80w+

累计阅读量



年度专题封面策划

精彩片段CUT



合作公益组织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	自然之友
盖茨基金会	阿拉善SEE珠江项目中心
蔡崇信公益基金会	南海区慈善会-I See青少年心理健康慈善基金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千禾社区基金会
深圳社会组织研究院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是光诗歌	深圳市罗湖区社工客社会创新发展中心
壹基金	成都微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